

巴山夜雨

抢救记忆 追寻真相 交流信息 积累资料

第 13 期 2012 年 2 月 10 日

目 录

【按“Ctrl”键+鼠标点击篇名选择】

~~~~~

|                                                      |         |
|------------------------------------------------------|---------|
| <u>我的一家（李国敏）</u>                                     | .....2  |
| <u>失学绝望的日子（陈仁德）</u>                                  | .....10 |
| <u>梦想恢复失去的天堂（李国元）</u>                                | .....14 |
| <u>长寿湖“右派”的文革遭遇（李普杰）</u>                             | .....16 |
| <u>一个“摘帽右派”被卷入文革的经历（林向北）</u>                         | .....21 |
| <u>萧瑟秋风今又是</u><br><u>——中山大学 57 年鸣放和反右运动杂忆之一（吴兴勇）</u> | .....38 |
| <u>教育家马客谈与一本《校友录》（何蜀）</u>                            | .....43 |
| <u>关于“老三段”（陶渭熊）</u>                                  | .....47 |
| <u>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语录</u>                                  | .....49 |

~~~~~

《巴山夜雨》电子邮箱：bsyy1957@yahoo.cn

我的一家

李国敏

按：在五十年代，曾出版过一本回忆录《我的一家》，由共青团中央向全国青少年推荐作为必读书，那本书讲的是一个家庭中的两代人，在民国时期如何参加地下党领导的造反、暴动而遭到“维稳”当局的打击以至坐牢、杀头等遭遇。此书后来被改编为电影《革命家庭》，广为人知。本文所写的是另一类家庭——“毛泽东时代”的“反革命家庭”，这个家庭的成年男性均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了“反革命”（后来都平了反，可见罪名之荒谬），关进监狱（有几位甚至屈死狱中），一个八口之家的家庭就由三位坚强的女性苦苦支撑着熬过了几十年的“红色岁月”。读罢此文，不能不对这个家庭中的男女老少成员肃然起敬，同时也不由得会想到：这样一个勤劳友善的家庭，既没搞造反，也没搞暴动，他们为什么会遭受如此的无妄之灾？

突然的变故

我的家原是康定有名的一个大家族，中共建政前，爷爷李先春把全家从天府之国四川带到偏僻落后的边疆康定。奶奶原是大邑县的农家姑娘，我家有大伯李万鹏、大嬢李群章、小嬢李华章和父亲李万钧。听妈妈说，爷爷不远千里来到康定，一家人齐心合力，在这里艰苦创业，为康定兴办了很多实业，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很受康定人的敬爱。大伯任西康省银行副行长，也是个搞业务的人。父亲从金陵大学机电专业毕业后，在爷爷创办的升航水电厂任厂长。父亲这一代的四个小家虽然都儿女成群，大家却仍围绕在爷爷奶奶身边组成一个温暖和睦的大家庭。

妈妈告诉我，1950年康定刚解放，我家就遭难了、破碎了。爷爷、大伯、幺姑爷（小嬢的丈夫）都是起义人员，却先后被抓走，都被判成“反革命”送进劳改营。

妈妈一人带着我们兄妹五人——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和我，很难再在康定支撑下去，就准备到成都与几个舅舅一起生活，好有个照应。正好有些朋友要回成都，妈妈一时没法准备好带着五个孩子上路，就请两家朋友和一家亲戚把几个哥哥姐姐先带出去，因为我还在襁褓中，妈妈必须带在身边。在上车时，四哥李国勇（我家是大排行，大伯李万鹏的孩子是大哥）拼命抱着妈妈的腿大哭，怎么也不愿离开妈妈，只好临时决定留下来，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分别由两家朋友和一家亲戚带走。把三哥带走的亲戚到成都后，怕受牵连，三哥就像皮球一样被几家亲戚踢来踢去，1954年最终被踢回康定。

妈妈正忙着收拾东西打点行装带我和四哥回成都时，爸爸不知为什么突然回康定来了，他刚下汽车，就被抓去关押起来，并判“贪污罪”送新都桥农场劳改。爸爸是水电工程师，他当时在四川，已被聘请去东北小丰满水电站工作。消息传来，妈妈一下子就傻了，怎么也不相信会有这样的“神话”，后来才知道爸爸是被骗回来的。爸爸被关起来后妈妈就不愿回成都了，她决心不管有多艰难都要在康定坚持下去，她要留在离爸爸最近的地方，尽管不能见面，也要在这里陪爸爸，等爸爸。

从此，妈妈带着我和三哥李国智、四哥李国勇三兄妹，走上了一条辛苦艰难的人生道路，跟本没有能力顾及到由朋友带走的哥哥和姐姐。这两家令我们感恩不尽的朋友收养了我的哥哥和姐姐，对他们像对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疼爱；哥哥姐姐也就安心留在这么好的人身边，

改了名，换了姓。所以我们兄妹五人就有三个姓。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我家没有男长辈，只有奶奶、妈妈、小嬢、两个表哥和三哥、四哥还有我，一家八口。

我家的男人全进了监狱，一天，一群荷枪实弹的军人端着枪托用力砸我们的家门，进门来，他们恶狠狠地说：“这房子已经被没收了，你们赶快收拾好随身衣服，滚出去！”几岁的哥哥们各自抱着自己妈妈吓得不敢动。在军人的监督下，妈妈一手抱着我，带着四哥尽快把收好的几件衣服打成一个包袱背上，小嬢也带着表哥刘洪豹和刘洪狮，大家扶着奶奶走出家门。我们一家几代居住了十几年的大房子立即被贴上封条。

全家老小被赶出了自己的家，站在街边，回头看看突然间就不属于自己的房子，望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康定这么大，我们该朝哪走，哪才是我们的容身之地啊？奶奶用身上仅有的一点钱，在西大街陕西老板开的云发药房楼上租了两间共约二十七、八平方米的房子。这是药房过去给学徒住的，非常简陋，因而租金也低。我们被赶了出来，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这两间可以遮风挡雨的陋室，就成为我们的栖身之处。

走进这两间小屋，家徒四壁，角落里一堆烂棉絮和几样烂家具，房主人还没有来得及把它们扔出去，这些就成了我们的宝贝。我们用砖和木板搭成几张床，把几件烂家具拆开，凑了一点不像样的桌椅板凳，我们铺的、盖的全是烂棉絮和打满补丁的被套。刚进破屋时，几个孩子还笼罩在被赶出家门的恐惧之中，挤在一起，茫然看着忙碌的妈妈。奶奶搂着我们说：“好孩子，不要怕，有奶奶在，有你们的妈妈在，我们的家就在，爷爷、爸爸回来就能找得到我们。”

我们在两个房间中的隔板上面开了一个小方洞，安装一盏二十五瓦的白炽灯，作为照明之用。这盏灯，带给我们光明，也带给我们思念。大家对这盏灯有特殊的感情，这是升航水电厂送来的电啊！为了建这个电厂，爷爷、大伯、爸爸和幺姑爷付出了多少心血，经历了多少艰辛。现在我们在夜里和监狱里的亲人们能共享的，除了天上的月亮，就只有升航电厂点亮的灯了。但月有阴晴圆缺，何况在监狱里能不能看到月亮还不知道，这灯却天天明亮，我们全家的男女老幼每天就在灯下“团聚”。妈妈常常在灯下哄我，轻轻地哼着：“孩子啊，快长大吧，你爸爸在灯那边看着你呢。”这就是我幼年时听到的“摇篮曲”。

我们住的房子紧挨着折多河，打开窗户就看见河水以排山倒海之势永不停息地奔流。夏天涨大水，汹涌澎湃的江流冲起巨大的石头翻滚而下，大石相撞，发出隆隆的轰鸣声，像山崩地裂似的，我们的小屋似乎就要坍塌在滔滔滚滚的急流之中，让人感到心惊胆颤。冬天，从雪山里翻卷而来的北风，夹着冰、带着雪，在墙外任意肆虐，呼啸盘旋，发出呜呜的吼声，像群狼在嚎叫，好像要把我们这房子卷起来抛上空中似的。开始时我们吓得大叫：“房子要被吹倒了，我们怎么办呀？”妈妈抱着我们，说：“老天爷并不可怕，它看我们这么苦，一定不会雪上加霜，它会保佑我们的。”慢慢地，我们也就习惯了，不怕了。这种穿斗结构的木屋保暖性能很差，怒吼的北风钻过缝隙嗖嗖地吹进来，屋里冷得像冰窖一样，一盆锯木面烧的小火，烟火熏黑了屋顶，却怎抵得过满屋的寒气？我们感到透心凉。一家人只好紧紧地挤在破棉被里，用体温来相互暖和，一天天熬过那漫长的冬夜。

春节到了，我们楼下变成欢乐的海洋。楼下“水井子”的水是从跑马山下浸流而出的温泉，泉水流出地面后，天然分成两股，经过人工挖掘整修成两条沟渠，再流入折多河。这里是康定人取水、淘米、洗菜、洗衣的地方。相传“水井子”的两条小溪里各有一支金鸭子，在静静的月夜，金鸭子戏水的声音有福气的人才能听得到。除夕之夜谁能听到金鸭子的叫声，

这一年他就会幸福吉祥；谁能抢到头水，也会有一年的如意。所以，除夕晚上，康定城内的汉藏人民在阵阵鞭炮声中，身着盛装手持香烛纸帛，络绎不绝地来到“水井子”处供奉龙王。一时间紫烟缭绕、烛光闪闪、宛如白昼，烛光撒落在水上，化成一朵朵五彩缤纷的丽花，更显辉煌而神秘。“水井子”周围热闹非凡，大家还带来了取水器皿，当时钟指到零点正时，全城鞭炮声一浪高过一浪，人们争先恐后将各自带来的木桶、茶壶等盛满水，兴高采烈地回家。康定人用这种方式取回新年的第一桶水，祈求来年好运。

每当这时，我们几个孩子都跃跃欲试，想去为苦难的家祈求明年能有个好运，但奶奶和妈妈阻止了我们幼稚的冲动。我们不能去和别人抢好运，我们没有资格得到吉祥如意，我和哥哥们只能趴在窗沿上看着欢天喜地的人群，望眼欲穿地等待那苦难的尽头。我常常和哥哥约好，大年夜千万不要睡，等人们都回家后，或许我们能听到金鸭子的叫声，我们的爸爸就可以回来，妈妈就不会再那么苦。可是每个年夜总是熬不了多久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始终没有听到那能带来吉祥的金鸭子的叫声。

冬天好不容易过去，春风送来了漫山遍野的野花、野草、野菜，这下子日子就好过多了，我们可以采野菜，肚子里总算可以多装一点东西。从春天起，歌声也经常随着风儿飘进我们的小屋。

跑马溜溜的山上，
一朵溜溜的云哟，
端端溜溜的照在，
康定溜溜的城哟，
月亮，弯弯，
康定溜溜的城哟。

歌声悠扬缠绵中带着粗犷，时远时近，飘飘渺渺；从窗户望出去，碧蓝的天空上逍遥着白云朵朵。这一切像配上了乐曲的一幅优美的画，显得和谐而优美，这时，苦难似乎暂时退离开去，我们的心放松了，身体也好像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融化在这美丽的蓝天白云之下动听的歌声里。

我们一家人在这破房子里整整住了二十多年。

一直到1974年，我们兄妹都长成大人了才搬走。现在想来，这样的生活环境并不完全是件坏事，它给了我们几个孩子很好的磨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自然教会了我们勇敢、坚强、无畏，至今我们兄妹都不忘给予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两间破烂的小屋。

坚强的妈妈

我们被赶出家时，大伯李万鹏一家人多，他们另外租了一处房子居住，奶奶已近七十岁，和我们、小嬢两家住在一起，八口人的生活重担就落在妈妈和小嬢肩上。小嬢是中医，在几个中医自发组织起来的联合诊所里当医生，工作相对要轻松点，妈妈就苦多了。

妈妈在中共建政前当过几年小学教师，后因孩子多，身体又不好，就没有再工作。五十年代初期，工作比较好找，但我们是出了名的全家“反革命”，没有哪个单位敢录用妈妈。为了我们能活下去，她只得去做别人最不愿干的累活、脏活、苦活，帮人洗衣服、补破烂等。

每天早晨天边刚露出一点点鱼肚白，妈妈就上路了，她要到离城四、五公里以外的南郊驻康部队领脏衣服和脏被子，如果去晚了，就怕衣物被别人领走。途中必经一段几里无人烟的荒地，那段路在灰蒙蒙的晨雾笼罩下，令人感到非常恐怖，妈妈只好带着才五、六岁的四

哥一同前往。回来后妈妈没有稍事休息，马上从木桥上越过折多河，到河对面的“水井子”担水回家。我们屋外有一个小平台，这里摆放着一个木盆，妈妈坐在小凳上弯着腰，低着头，用力搓洗衣服。军人的衣物又脏汗又重，妈妈不停地刷着、搓着、揉着，只见她的身体有规律地前后摇动，一会儿反过手来吃力地捶捶腰，一会儿举手擦擦汗，最后她双手撑着盆边慢慢站起来，担着洗过的衣物又过桥去“水井子”。从跑马山上流下来的水清澈见底，在这里，妈妈把脏衣物漂洗得干干净净，再担回家，晾晒在平台上。黄昏，她把晒干的衣服、被子折迭得整整齐齐，拖着疲乏不堪的身子，把衣物送回部队，才能领回工钱。为此，妈妈每天要走三、四个小时的路，劳碌一整天，晚上，还要领些缝补的活回来做。我们总是看着她在灯光下的身影入睡，从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睡觉。

到了冬天，大地、山峦、树木被白雪覆盖，就像披了一件白色的外套，整个世界显得萧瑟、凄凉。冬日白天短，早上出门时天还没有亮，刺骨的寒风迎面呼啸而来，像鞭子一样抽打在脸上。妈妈和四哥用破围巾把头包裹起来，弓着身子在风中挣扎着前进，路面上的薄冰踩下去发出“喳喳”的响声，不小心摔一跤，会跌得鼻青脸肿。跑马山的水流到我们这里，已经寒冷彻骨，洗完衣服，妈妈的两手又红又肿，血从裂开的口子里渗出来。我捧起妈妈的手，用我的小手去捂住，把我的小脸紧贴在妈妈冰凉的手上，我不知道妈的手有多痛，只是见到她一天比一天消瘦，一天比一天苍白。风雪中洗好的衣物不能晒干，就在家里用火烤，仍然必须当天送回去。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妈妈和小嬢拼命干活的收入，也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半饥半饱的生活。妈妈为了多挣一点钱，有一天去得更早，想多领些衣服。谁知部队守门的大狗一跃而出，四哥躲避不及，顿时，恶犬的狂吠声、四哥恐惧而痛苦的哭喊声、妈妈惊慌失措的呼救声，一齐响起，才有人出来把狗拉开。可怜的四哥扑倒在地上，背上血淋淋的一大片，他又吓又痛，早已昏过去了。妈妈顾不得受伤的四哥，先去领了脏衣被，才把四哥抱起来，泪水只能往肚里流啊。妈妈挎着领来的衣物，背着哭哭泣泣、满背鲜血淋漓的四哥回家，含泪把四哥交给奶奶照顾，又马不停蹄地开始每天必不可少的劳碌。四哥爬在床上，奶奶剪开他的衣服，清洗他身上的斑斑血迹，露出一片还留着恶狗齿印的硕大伤口。四哥的声音都哭哑了，他软弱无力地说：“奶奶，我好痛啊！”奶奶的眼泪刷刷地往下掉，说：“好孩子，忍忍吧，等小嬢回来给你上了药，就不会痛了。”好不容易盼到小嬢下班回家，四哥才得到治疗包扎。至今四哥背上还留着一块大疤痕。

妈妈付出最大的努力，硬撑着虚弱的身子，和小嬢、奶奶共同顶起这个八口之家，承受了小姑爷、大伯、爷爷先后死于狱中那些令人悲痛欲绝的噩耗，她们仍毫不动摇地为保全这个家而尽心竭力。大家心里都怀有一个希望，那就是我爸爸，爸爸不是“反革命”，他的“贪污”罪名本来就是无稽之谈，五年的刑期不算太长，大家一心盼着爸爸刑满释放。妈妈守着一份刻骨铭心的感情，日夜计算着爸爸的归期。我这个生下来还没有见过爸爸的孩子，也在想象着爸爸是什么样子，期望爸爸回来后，妈妈就不会再那么劳累。可是，五年过去了，爸爸没有回来，六年过去了，爸爸还是没有回来，不久传来消息，爸爸留场就业了！爸爸的留场就业，和继续关押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仍然只能守着那盏孤灯，与爸爸在灯下“相会”。

妈妈本来就体弱多病，加之沉重的体力劳动，洗衣、担水、上山背柴等，每天休息时间很少，营养又不良，身体极度虚弱，得了红崩症。经常大出血之后就造成严重贫血，六十年代初已不能下地干活。她躺在床上，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只有那双熠熠的大眼睛，仍闪耀着顽强的生命之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也没有闲着，也不敢闲着。妈妈心灵手巧、聪

明能干，无论什么手工活，她只要看两眼就能学会，如织毛衣、做针线等，她一看就会，而且比别人做得更好、更精致。她不能再洗衣了，就给裁缝师傅做手工，盘各种样式的花纽扣，在衣服上订布纽扣，每天从早到晚一针一线不停地做。一家八口每年谁的衣服需要缝补，谁需要做新衣，这些也都是妈妈的事。每天她最多能睡上四、五个小时，我们睡觉的时候她在做，等我们一觉醒来，她还在做，就这样没日没夜地干，才能挣够我们兄妹的生活费和学费。我们做儿女的看着真是心疼，我和哥哥抱着妈妈说：“妈妈，我们不读书了，我们要帮你干活。”

妈妈听了我们的话，非常生气，她厉声地说：“你们谁都别想不上学，我的事不要你们管，你们只要把书读好就行！”我知道妈妈的一片心意和期望，除了用优秀的学习成绩报答妈妈外，还想方设法为她分担。我从小就学会帮妈妈去裁缝师傅那里领衣服回家，妈妈做好后，我又一家家送回去，从来没有出过错。所以那时上学放学我的手都不会空着。三哥手巧，就帮妈妈做针线活。假期和星期天，大表哥刘洪豹和三哥、四哥都上山砍柴背柴。这样，除了保证一家全年的燃料，还可以拿到市场上卖，以换取最低的生活补贴。

妈妈经常大出血，每次都是九死一生，可是爸爸刑满快十年了，却不能请假回来照顾妈妈，全靠小嬢医术高明，每次都让妈妈化险为夷。偶尔，爸爸会在我们毫无思想准备的时候回家，每次他只能在家待一、两天。六十年代初的一天，妈妈的红崩症又犯了，爸爸突然风尘仆仆推门进来。妈妈面黄肌瘦、衰弱不堪地躺在木板搭成的床上，看见爸爸回来，她有气无力地向爸爸微微一笑，泪水顺着眼角缓缓淌下。爸爸扑向床前，一把抓起妈妈的手，一腔苦泪夺眶而出……爸爸没有自由，第二天一早又得赶回农场。临行时，妈妈面色青黄，静静地躺着，用痴迷迷的眼光看着爸爸，眼睛一眨也不眨。爸爸满脸无奈，恋恋不舍地走出家门，站在门口，他又回头看看妈妈，才转身踏上那不知何时能够结束的“劳改”之途。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啊！

后来，爸爸曾写了这样一段话：“李母徐馥华，出身名门，曾在成都女子中学肄业，由于体弱多病，随兄嫂旅居蓉（成都）、雅（雅安）两地养病。解放初期家庭遭受巨变后，凭她坚毅不屈的志气，除做到力所能及的工作挣钱供家养口外，还使国智、国勇、国敏都受到中学教育，在她重病之时，我亦未能亲自照顾过。一九八五年不幸逝世后，为感激她，即决心‘从一而终’，并愿我的身后，能葬于她的墓侧，永世相伴。”

奶奶是一座不倒的山

奶奶是一位勤劳、俭朴、慈祥的老人，我家突然遭到大难、赤贫如洗时，妈妈和小嬢都有些惊惶。奶奶却处变不惊，说：“天干饿不死勤快人。”还说：“我们死不得，一家大小全靠我们来支持！”她已近七十高龄，毅然承担起全部家务劳动和家事的管理安排。那时，我们的一日三餐真难啊，奶奶却尽量安排得合理。八口之家 一月最多买十斤大米，其余全吃玉米面，因为大米一毛五一斤，玉米面五分一斤，我们每周两顿大米饭，其余都吃玉米糊。一年四季的菜，以土豆、萝卜、四季豆为主，这些菜只要一、两分钱一斤。因为总买最便宜的菜，我们还中过几次毒。我们每个月买两斤肉，真是肉管三天，汤管七天，骨头管一个月。奶奶每天都把那一点点骨头拿来熬汤，每次几乎都要把骨头熬烂才肯丢掉。

我很小的时候，妈妈一早去领衣服，奶奶就给我穿衣，照顾我起床。等妈妈回来，奶奶用开水调一些青稞面，妈妈吃一点，我吃一点。康定是高寒地区，冬天是属于冰雪的天地，到处挂着又粗又大的冰柱，我们住的房子寒冷彻骨，没有钱买炭或用电取暖，奶奶就安排我

和二表哥刘洪狮去背锯木面。当时，锯木面又多又便宜，一分钱买一小背，我们每人每周去背一小背回来，背半年就能供一冬的取暖之用。下雪天上学，踩着冰和泥泞到学校，棉鞋已浸湿，只好把两脚压在屁股底下让它麻木了就不觉得冷。下午穿着湿鞋回家，家里的火要用来烤妈妈洗的衣服被子，轮不上我们烤，做作业时仍把脚压在屁股下面。等妈妈烤干了衣物，奶奶再蹲在火盆边，翻烤全家湿透的棉鞋，不知奶奶要烤到什么时候才能烤干它们，也不知奶奶在灯下为全家做单鞋、棉鞋要做到什么时候才能睡觉。

为了改善生活，七十高龄的奶奶带领我们在郭达山麓开荒种地，四处积肥。奶奶种地，几岁的我和刘洪狮担水担粪。等到收获的季节，奶奶带着我们担着自己种的蔬菜欢欢喜喜回家，全家就有一段时间不用花钱买菜。她还在家里养兔，我们每天放学后，打一大背兔草，虽然人畜共处一室，我们却很快乐，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双手为这个家出力，生活也逐渐开始好转。

每逢到二道桥洗澡，奶奶就带上刘洪狮和我，拿一个大布袋，来回的路上边走边摘野菜，如灰灰菜、枸杞芽等，我们每次都可摘满满一布袋。这时去二道桥温泉洗澡可不比从前，爷爷在改建二道桥浴室时，特别修了一个大池，免费提供给没钱买票的穷苦老百姓洗浴，还为他们备有茶水。现在浴室被接管了，洗大池要收五分钱，喝茶水也要钱。去洗澡的人少了，我们也是偶尔去一次而已，洗了澡后口渴难忍，也不肯拿钱喝茶。过去穷人不用掏钱就能洗澡的日子已是昨夜星辰了。

奶奶全心全意为这个家，她也受到全家人的爱戴和敬重。三年“自然灾害”时，在粮食紧缺、大家都吃不饱的情况下，每顿煮饭，不管是米饭还是玉米面，妈妈都要叫我们先给奶奶盛一碗干的单独蒸好，剩下的再加上一锅菜，我们吃稀的。这样，在那最艰苦的岁月里，奶奶没有得过浮肿病。奶奶的身体一直很健康，于1973年八十七岁与世长辞。在奶奶、妈妈、小嬢身边成长，我稍大一点就包揽了所有的家务事，也炼就了勤俭治家、艰苦创业的本领。哥哥们也勤学肯干，我们一家在逆境里，相互关心、相互谦让、团结和睦、尊老爱幼，继承了爷爷传下来的李家家风。

名医小嬢

爸爸被关押不久，妈妈和小嬢都被定成“反革命分子”被“包夹”起来，失去了自由（包夹的意思是：由两个人共同管制）。她们每月要向包夹人汇报思想和行动，还要参加无休无止的义务劳动。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两位母亲咬紧牙关，相互勉励、相互安慰，携起手来，以她们伟大的母爱、坚强的意志把我们五兄妹培养成人，再苦再累都不让我们耽误学习。苦难中，我们一家抱得更紧，爱得更深。

小嬢李华章每天早出晚归。虽然是医生，但因身分是“反革命”，不同于常人。早上，她得比别人提前去收拾整理，下班后，大家都走了，她还要打扫干净诊所才能回家。在诊所里她总是低人三分、忍气吞声地既当医生又当工人。小嬢看病格外小心，望、闻、问、切，丝毫不敢马虎。她医术高明，对病人态度又好，桌前总是排着长队。这就招来有的医生不满，她经常被挖苦、嘲弄、谩骂，稍有不慎，就遭严厉的批判斗争。那时，她是说什么就错什么，不说什么也错什么，小嬢吞下的苦水真是不可斗量啊！即使这样，小嬢仍被强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刑坐牢一年半（八十年代平反）。

那时，医生都要下乡巡回医疗，诊所的人都轮流下去。小嬢是必须改造的“反革命分子”，几乎每次必去，一年在家的时间屈指可数。幸亏有奶奶，小嬢才不耽心她那两个幼小的孩子。

小嬢每次都被派到不通公路的边远山区，背着沉重的药包翻山越岭，一步一步在陡峭的山路上跋涉。每到一处，队里的人都坐下休息，她却先要去做好队里的后勤服务，当好队里的工人，所以她比其他人都累，但她总默默地承受着。有时，上山下谷要走好几天，一路上，小嬢用最大的毅力坚持着，当她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家时，连动一动的力气都没有了。小嬢也就这样走过二十多年，熬成了老人。但她老了也得参加巡回医疗，六十岁多的老人背着药包跋山涉水，每次回家，双脚满是血泡，腿肿得不能下地。再加上没完没了的义务劳动，小嬢累死累活都看不到希望。

每到“运动”时期，小嬢都要被抓去斗争，有时在诊所斗，有时在街道斗，挨打、挨骂、罚跪都是家常便饭。妈妈病重出不了门，街道就组织人到家里来开批斗会。

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嬢和其他四类分子经常被弄去游街，地、富、反、坏、右胸前各有黑字标记。每人头上戴着巍峨的纸糊高帽子，帽下露出乱糟糟的头发，造反派用席子裹着这些人的身体，把她们一个个裹成桶的样子，身体滚圆，蓬头垢面。两支手从席子上挖的洞里伸出来，拿着铜锣和锤子，一边走，一边敲锣，一边被逼自报身份。小嬢也是低头不停地敲一下锣，说一声：“我是反革命。”一群被弄成奇形怪状的人，迈着杂乱的步伐，拖拖拉拉、跌跌撞撞地走在大街上。造反派驱赶着他们游街，还不断高喊：“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路上围观者甚多，有人随手捡起石头、烂菜、木棍扔过来，打在小嬢的头上、身上、脸上。每次游街完毕，除了身上的伤痕、脸上的污秽，最让全家心痛的是小嬢那倍受摧残的心。小嬢咬牙坚持却难于熬下去，奶奶最会察言观色，从小嬢表情上的细微变化，看出了她的心思。是奶奶的关心、开导和支援使小嬢经受住一次又一次的折磨，承受了被踩在脚下的熬炼，好不容易等到“平反”的那一天。小嬢“平反”之后，任过甘孜州及康定县的政协委员，被四川省评为名老中医，继续用她那高超的医术治病救人。

小嬢是我们的家庭医生，是她给家里生病的人看病拿药，幸亏有她，二十多年来，我家没有一个人住过医院。妈妈的红崩症和因此而造成的严重贫血，都是小嬢精心治好的。三哥患了伤寒症，连续好多天高烧不退，满身红斑，腹泄不止，家里没钱送他进医院，也是小嬢从鬼门关把他抢了回来。小嬢也活到八十七岁高龄，2000年11月离开了我们。

成长总是快乐

常言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们平常都抢着帮妈妈做事。妈妈病重不能出门，她每月的书面汇报就由我帮她转交给包夹人。她不能参加义务劳动，就由我们几个孩子轮流代劳。从此，每次衣衫破旧、低头弯腰的“四类分子”义务劳动的队伍里，就多了一个十来岁的瘦小孩子，我们低眉顺眼地走在乱糟糟的“坏人”队伍里，在监管人员恶狠狠的眼光下干着又脏、又累的义务劳动，简直是无地自容。我心里充满了屈辱、自卑，我的心在流泪、在流血啊！但我还得硬头皮走下去。为此，我们平常走在街上，我们经常都有做不完的义务劳动，比如扫厕所、扫大街、修路、栽树等等，这些革命群众不愿做的事，都由“四类分子”去完成。每周星期六下午要扫院子，居民小组长一喊，我就赶快拿起扫帚下楼，这种劳动对我来说压力不大，一是因为扫自家的院子，更主要的是邻里们都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他们不歧视我。

让我最伤心的是到外面去栽树、修路等。那个年代大大小小的造反派组织繁多，随便哪个组织都可以任意支派“四类分子”去干那干不完的义务劳动，实行所谓劳动改造。每当通知第二天要修路或者栽树，晚上我就蒙着被子悄悄地哭。第二天早晨妈妈看见我红肿的双眼，

心疼地说：“孩子啊，是我们连累了你，你不想去就算了吧。”我说：“不行，我必须去。”我知道如果我不去，那些人就会来找麻烦，到家里来批斗妈妈。妈妈她劳累成疾再也经受不住批斗了。一路上，我排在“四类分子”的队伍中，把头埋得低低的，就怕碰见熟人，听到有人在小声说：“怎么有这么小的四类分子？不知她犯了什么罪才来劳动改造……”霎时，血一下子冲上我脑门，脸涨得通红，我恨不得地下裂开一条缝钻进去，因为这事，平常我还经常遭到一些人的辱骂，但我们只能把屈辱和愤怒埋在心底，从不告诉妈妈。就这样，没完没了的义务劳动，伴随着我从少年走到青年，从青年走到成年，直到我结婚成家后才摆脱掉。

我们兄妹很懂事，学习都很努力，从没有让妈妈们操过心。1962年大表哥刘洪豹已上高三，三哥李国智也进入高二，两人学习成绩都很优秀，还担任了科代表，但因为他们是“反革命”的孩子，两个人都被学校勒令退学，他们不得不就此告别了学生生活走向社会。妈妈和小嬢都很伤心，她们逆来顺受、苦吃苦做，一心想把孩子们培养成材，如今连这个梦也破碎了。

为了减轻母亲们的重担，也为了自己的前途，哥哥们四处奔走找寻工作，但我们这种家庭的人，什么单位都不会录用，谁听了都摇头，就业的门路全被堵死。当时群众组织起来的建筑队，活重、工资低、无任何保障，一般人都不愿去。两个哥哥就去那里拜师学木工、泥工手艺。可是，“四清运动”一来，这种无人肯干的工作也不让他们干了，从师未满三年，就不让师傅带他们了。他们和母亲一样，也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上山伐木、挖药材、抬条石、拉架架车等，总之，最苦、最累、最无人干的活他们都干遍了。哥哥们用自己的行动写下了一个大写的“人”字，传承了李氏家族世代相传的精神，也让母亲们感到很大安慰。

文化大革命时，我家又理所当然地成了斗争的对象，除了例行的挨斗、游街外，“红卫兵”还来抄家。这次只能让他们失望了，他们抄了半天，除了十几年的尘埃和地上的老鼠屎，翻不到任何他们看得起的东西。他们一边往外走一边说：“今天真倒霉，怎么走到康定最穷的一家来了，什么也没捞着。”

我从记事起，就深感我们这种家庭的人与别人不一样，我们总是比别人矮一等。等我长大，靠自己劳动挣钱来帮助妈妈撑家已经非常必要了，但它对于我来说却又是我不敢奢望的事。和我同龄或者比我小的人都分配了工作，而我除了义务劳动忘不了我，安排工作却根本轮不上我。我已到了应该自己养活自己的年龄，我想，没有工作我或许可以找点临工做，于是去找有关单位，诚惶诚恐地恳求道：“我妈妈病重，不管多苦多累的工作我都愿意做，哪怕只是短期的也可以。”负责干部斜着眼，拖长了声音回答：“你也不想想你是什么人？谁给你那么大的胆子，竟敢来和贫下中农抢饭碗！”我低着头，心里那苦味就没法提了。我仰望苍天，多么无望，多么无助啊！那时我唯一的活路只是在家跟着妈妈学织毛衣、做针线活儿，我还包揽了里里外外的家务事。也就从那时起我学会了坚强，学会了承受，也学回了吃苦耐劳。

在那段日子里我没有与同学来往，就连最要好的朋友都失去了联系，有时在街上远远的看见她们就赶快躲开，生怕连累别人，更怕看见蔑视的眼光。

在四处奔波找活干的日子里，我结识了一位憨厚、老实的工人，后来我和他成了家。作为房管部门的家属，我现在不愁没活儿干了。房管科主要是管房屋的维修管理，还要修建职工宿舍。建筑工地上的工作很繁重，开始我只能干点杂活，给泥工师傅打杂。我背水泥、背砖、背瓦、背石头，担沙灰上几层楼的房架，上房翻瓦捡漏，甚至掏厕所出大粪，我干着各种和男人一样的活。工作虽然又累又脏，但是至少我能够正大光明地为自己的生存、为病弱的母

亲和养儿育女那份责任而付出我的劳动。

我的心里有一个计划，我不会永远干这份工作，从这里开始，我还要往前走。慢慢的我向老师傅学着做一些技术活儿，像安电灯、安门窗玻璃等，我向前迈开了脚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家长辈相继得到“平反”，后来，我也从临时工转正，终于有了一份正式工作。但我还是没有满足，妈妈的话时时激励着我，我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我努力抓紧时间学习进修，终于考上了成人中专。可那时我已经四十岁并且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班上的同学比我小很多，他们的基础比我好，反映也快。我只能笨鸟先飞，用十倍的努力，百倍的刻苦，来弥补我的不足，终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来我又考上干部，成了国家公务员。

1975年，爸爸终于被放回来了，紧接着的几年，爷爷、大伯和大婶、小嬢和小姑爷、爸爸和妈妈都得到平反。可是爷爷、大伯、小姑爷早已冤死狱中，一家人再也没有团圆的可能了。爸爸平反后，一如既往投身于康定的小水电站的建设，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继续为康定人民做贡献。2006年夏以九十高龄病逝。

现在，长辈们都相继离开了我们，我也步入了老年。我们兄妹永远忘不了过去那漫长的受苦受罪的岁月，更不会忘记奶奶、妈妈、小嬢在艰苦日子里表现出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那就是她们留给我们最珍贵的财富。

失学绝望的日子

陈仁德

对“有教无类”的颠覆

我经常感叹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为什么能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那时中国还处在所谓奴隶主义向封建主义转化的时代，这位老夫子就认为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真是让人敬佩。历史发展到了二十世纪，据称中国进入了最美好的最优越的社会主义时代，可是许多人反而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被赶出学校的大门。人们被无端的划为“红五类”“黑五类”甚至“灰五类”“麻五类”，除了“红五类”家庭的子女，其余几类读书通通比登天还难。“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被反复批判，直到没有一个人敢再提起。

我不幸出身于一个读书世家，这一点决定了我还在娘肚子里就已经被剥夺了受较高教育的权利。在过完13岁生日不久，当我还是一个天真少年的时候，失学的危险就已经降临，那时我刚念完小学。

那是一个火热的夏天，七月里，我通过升学考试，很顺利地拿到了忠县一中（今忠州中学）的录取通知书，然而就在八月底我准备报名入学时，却被告知：我的录取通知书已经无效，其理由是学校的大门要向贫下中农敞开，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不能入学。我当时还不懂得悲伤，只是痴痴地愣着，但是父母却十分伤心，儿子才13岁就失学了，今后怎么办？而且，我们家也并不是什么地富反坏右，只不过是世代读书人家，在所谓的旧社会做过一些小小的事业而已。

历史性的经典对话

父亲那时在县人委（政府）财政科（后来改为财政局）作会计，与文教科（后来改为文教局）在同一座楼房办公，所有工作人员朝夕相处，彼此都很熟悉，父亲便去文教科找一个叫李邦珍的女干部，希望能解决我入学的问题。那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永远难忘的日子，当时那位干部正坐在圆圆的藤椅上看一份文件，她一边继续看文件一边漫不经心地听我父亲的陈述，当她明白我父亲的用意后缓缓地抬起头来，眼光在我父亲脸上足足停留了三分钟，好像从来就不认识似的。她并不回答我父亲的问题，而是出人意外地反问我父亲：

“听说你们家世代都是读书人，是吗？”

我父亲不知这话的用意，就老实地回答：“是的呀。”在父亲心目中，读书是一件很高尚的事情，所以只要说到自己的祖宗他就有几分骄傲，即使在那个年代也在心中暗暗保留了一丝得意之情。

姓李的干部接着又很认真地问：“那么，你算一下，你们家到现在一共有多少代读书人了？”

父亲听到问自己家里有多少代读书人，心里那点可怜自豪感就又一次冒了出来，于是他屈指计算了一下回答说：“据我所知，从晚清以来共有四代读书人了。”

父亲以为那位姓李的干部接下来要谈我入学的问题了，谁知她忽然将手里的文件往办公桌上扔，长长地冷笑了一声，眯着眼睛很鄙夷地说了一句谁也想不到的话：“既然你们已经有四代读书人了，还想读什么书？该让别人去读书了！”

我父亲当时的狼狈可想而知，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从那间屋子走出来的，他只是感觉到，当他转过身来后，有一道可怕的目光像利剑一样从后心穿过来。

这一段精彩的对话堪称那个时代的经典，它所具有的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在简短的话语里所包含的深刻的前所未有的教育思想，完全可以写入中国当代教育史。应该指出的是，那位姓李的干部本身并没有什么对和错，她只是时代的代言人而已，她本人不会也不可能创建出这种不同凡响的教育理论。所以我对她从来没有一点怨恨。

失学的阴影笼罩着我，我毕竟只有13岁呀。

父母无计可施，最后只好转而设法让我去上一所民办中学。民办中学条件很差，在社会上备受歧视，一般都是“黑五类”子女或者“红五类”子女中成绩太差的人，实在走投无路了才会去上民办中学，有人把民办中学比喻成“社会渣滓收容所”，其地位可知。

在民办中学，我度过了一生中可怜的一年中学时光。第二年，中国爆发了后来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来就惨淡无光的民办中学一下被彻底砸烂，校长被拉出去“假枪毙”，又被打成重伤不能下床，学校全部瘫痪，学生四出串联，我终于失学了。

在之后二十余年的漫漫岁月里，我没有一天走进过教室，我被命运抛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下乡当过农民，进厂当过工人，到山区当过营业员……

我亲手焚烧祖宗的藏书

文革使中国进入了文化毁灭的时代，古今中外的所有优秀文化被统称为“封资修”，经典的文学作品都被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全是“大毒草”，读书人都成了罪人——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书店里除了毛泽东著作之外什么也没有，对于一个渴望读书的少年来说，那是一个多么绝望的时代。

我家世代藏书数万册在文革中全部付之一炬。说来现在可能没有人相信了，我家的书并没有人来强行焚烧，竟然都是我们自己乖乖地背到长江边去燃起熊熊大火烧掉的。经过十多

年政治运动反复折腾后，我父母天天如同惊弓之鸟，好像随时都会有大祸临头似的，一有风吹草动，马上想到的就是如何躲过灾难，所以文革掀起“破四旧”的高潮后，父母当机立断，决定自己革命，不要等别人来抄家。在1966年炎夏的一天，我们家族的兄弟们用大背篓把祖上留下的那些珍贵典籍，包括列祖列宗亲笔撰写的多种著述，家传的大量名家字画……全部背到长江边上点火焚烧。大火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江边厚厚的石梯都被烧炸裂了，才终于将堆成山一样的书籍化为灰烬，江水卷起的浪潮将灰烬慢慢冲走，江中出现了一条长长的黑色灰烬带，直到很远很远……

这时要想读书，已经是痴心妄想，我三十岁生日组诗里有一首便是回忆这一时代的：

群魔次第舞，是我少年时。十载嗟多劫，一生恨少知。

血光污汉史，毒火焚唐诗。欲学如何学，神州尽鼓鼙。

但是我依然做着读书的梦。

焚书高潮过去后，局势稍微平静了一些，这时父亲无意中听说某前辈手里还藏有一本《唐诗三百首》，在我的请求下，父亲鼓起勇气去借来了这本珍贵无比的书。那位前辈胆战心惊，一再叮嘱万万不可为外人道，并且必须在一周内完璧归赵。这是一本喻守真注释的《唐诗三百首详析》，我捧在手中如获至宝，为了按时归还，我连夜连晚将全书抄了下来，从此便有了自己的第一个读本。我终身嗜诗如命并在诗词界小有虚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本书打下的基础。

公安员出动收缴《西厢记》

20岁前后，我通过对残留在民间的断简残编的搜求，陆续读到了一些星星点点、支离破碎的东西。1976年，我在重庆工作的叔叔把他保存的一本爷爷读过的《西厢记》送给了我，爷爷在上面用毛笔写着许多批注，通过这本书，我也进一步认识了在我10岁时就已经去世的爷爷。这是建国后我叔叔买的一本《西厢记》，爷爷发现这个版本不是以前的版本，就凭记忆用蝇头小楷将全书还原成了以前的版本，这足以证明爷爷的饱学和惊人的记忆力，而这不过是爷爷一生熟读过的无数书籍中的一本而已。不仅如此，爷爷的毛笔小楷之漂亮也令人称奇。

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西厢记》前面的内容大段大段地背了下来，正当我进一步通读的时候，这本书却惹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那年我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女友，她在一所山区小学当教师，她偶然见到了我的《西厢记》，要求借回去看看，我当然不能拒绝，在一再交代这本书对于我的重要性和可能带来的危险性之后，我把书给了她。

女友回校后不到一周，有一天，她发现学校里气氛十分紧张，校长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她，她感觉好像要出事了，但猜不出会是什么。一会儿，公社的公安员带着几个民兵神情严峻地出现了，他们直接走到她的寝室里来，问她最近看了些什么书。她心里咯噔一声，假装镇静的样子，随便说了几本革命书籍。公安员便提示她，有没有看过立排版的书。她依然假装不知道。她想，会有谁知道《西厢记》的事并且连立排版这样的细节都掌握了呢？

公安员在寝室里很不耐烦地走来走去，忽然走到床前猛地掀开枕头，从下面抓出了一本书——正是那本《西厢记》，然后回过头冷冷地问：“这是什么？”

女友霎时紧张万分，就像做了坏事一样抬不起头。

事后得知，是一位和女友关系密切的年轻的女老师出卖了她。

这事很快通知到了我的工作单位，公社革命委员会一位姓刘的副主任对我说：“好反动啊，全是立排版的！”我当时不揣冒昧，回敬他：“立排版的不一定是反动的，毛主席著作也有立排的。”主任狠狠瞪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

我叔叔在重庆听说后气坏了，因为爷爷的手迹从此再也没有了。

公安员随后将《西厢记》交给了区文教助理万世之，万在后来的一次大会上就此进行了严肃批评，让我女友很狼狈。

当年九月，毛泽东去世，随后，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次年一月，我在《人民日报》上偶然看到《西厢记》的名字——居然被称为优秀民族文化作品。我一下激动起来，马上给那个文教助理去信，要求归还《西厢记》，但是没有回音。我又连续给县委宣传部去了三封信，要求督促归还《西厢记》，其理论依据都是《人民日报》的文章——这在中国是所向无敌的。最后，我终于拿回了那本受尽侮辱的《西厢记》。

又过了大约一年，《西厢记》再版发行了，我买来一本给那个万助理寄了去，我在扉页上写着“送给万世之阁下，《西厢记》的艺术魅力是永存的！”听说万收到后恼羞成怒，说：“怎么能叫我阁下，阁下是资产阶级的称呼！”

现在想起来，别的都不可惜，只是可惜误了我的学习，如果当时不受影响，可能我快要背完书了，后来完璧归赵，我已经没有了热情，只是随便看了看。如今快30年了，我仍能背诵出前面的许多内容：“九曲风涛何处显，正是此地偏（双人旁）。带齐梁、分秦晋、隘幽燕。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归舟紧不紧，如何见，似弩箭乍离弦”……

三年后，我重过那所山区小学，想起当年之事，写了一首小诗：

世事纷纭亦舞场，驱车重到此山乡。野原新雨初落叶，古道寒云正夕阳。

潦倒都缘人险恶，沉沦倍觉夜漫长。西厢竟若雷霆怒，令我于今笑断肠。

诗写得不好，所以我从未收入集子，今天走笔至此忽然想起，不妨附在这里以作佐证。

忽然想放声痛哭

改革开放后，古老中国的文化开始复苏，书店里又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我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偷偷摸摸地读书了，我开始有计划地自学。由于基础差，无人辅导，缺钱购买必要的书籍，我又长期奔走乡下，每月有20天以上不在家，自学的困难有多大，要付出多少心血，不是亲身经历很难想象，这里亦不必讲述——讲也讲不完。可以告慰祖宗的是，在失学21年后，我以初中一年级的文化基础考入了四川大学，我的分数高出了录取线100多分——那年我已经35岁了。

其实还在考入四川大学之前，我已经发表了许多作品，引起文化界的关注。我搜集整理并注释了白居易的全部忠州诗，撰写了忠县白公祠修复开放的所有文字包括大门对联，编写了《忠县志》的《人物志》《金融志》等篇章，整理撰写了许多地方文史资料等等。

在大学里，我的专业是国民经济管理，但是毕业后我并没有机会用上我的专业，后来我用得更多的还是文学方面那些通过自学获得的知识。

我在地域文化方面很多年来一直保持了浓厚的兴趣。我在上海图书馆和四川大学图书馆意外找到了忠县前清著名诗人李芋仙的资料，进而对其进行研究，发表了十多篇文章，使这个几乎被遗忘的全国第一流的诗人重放光彩；针对一些地方争夺名人的不良做法，我对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巴蔓子、甘宁等人的原籍进行考证，证明了他们确实为忠县人；我对历史上流

寓忠县的名人白居易、陆贽等的行踪政绩作了系统阐述，基本理清了轮廓；我对吴恩宏、罗广文、沈芷人、谢锡九等一系列人物的史料千方百计搜集，写作了大量传记；我对三峡文化进行探索，推出了关于三峡民歌、三峡风俗、三峡考古、三峡人物等方面的许多文章，同时，我还创作了1000余首诗词，荣获过首届中华诗词大奖，成为巴蜀诗词界最活跃的人物之一；撰写了大量新闻稿件，荣获过全国和全省新闻一等奖。

2002年秋天，家乡忠县长江大桥竣工后，桥头树起了一个高高的纪念碑，十分荣幸的是，碑体上用60平方米的青铜铭刻着的《忠州赋》是由我撰写，并由著名作家、县人马识途书写的，这已成为长江边上的一道壮丽风景，气势雄健而磅礴。当我徘徊在桥头，仰望高高的纪念碑时，心里会升起种种复杂的情感，那一天，我猛然想起了当年文教科那个姓李的干部和我父亲的经典对话，不禁感慨万分。当年谁也没想到，30多年后，会是由我来撰写《忠州赋》。

“临江故郡，巴国旧疆。西接平都，东望瞿唐。背巍峨之巴山，峰峦葱郁；面高峡之平湖，烟波浩茫……”吟诵着《忠州赋》的句子，我忽然想放声痛哭，真的……

2003年12月6日

梦想恢复失去的天堂

李国元

14

1957年我23岁被打成右派，到1978年摘掉右派帽子，被劳动改造了21年。在这21年的漫长改造生涯中，当然不乏辛酸、悲苦之事，但也还有梦想成真的事情。

在长寿湖同兴学习班十几年的“右派改造”生活，就是白天劳动惩罚，晚上思想改造。所谓思想改造即“自我检查、批判，互相监督、揭发。”说白了，就是自己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互相之间泼脏水。比如回顾1957年的事情说：“我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写了几张大字报……”立刻会有人严正指出：“不要为自己涂脂抹粉了，你是响应号召吗？你那是趁党整风之机，疯狂向党进攻，恶毒污蔑……”说自己某某年参加革命或入党，也会有人给你指出：那叫混进革命队伍或打入党内。

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报刊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警句：“……那些被打倒的阶级敌人，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时刻刻梦想恢复失去的天堂。”当然这也就成了我们经常要对照检查的镜子。那时，检查批判，强调要上挂黑主子下打活靶子。上纲上线要上够。所以，联系实际自我批判也是颇费踌躇的。我不知如何谈起，因为我家既不是地主，也不是资本家，少年时代时正值抗日战争，是逃难的难民。抗战胜利后回到家乡，原来的宅子经历战火，只剩下7间房屋，自住3间，父亲失业，生活就靠出租余下的4间房屋的租金。一介城市平民，哪儿来的天堂？这时，有人的检查批判给了我启发。

有的难友检查：1963年，有的人调回原单位，我们送行的时候说：解放碑见（注：解放碑是重庆的标志性商业中心，犹如北京的王府井）。这就是一种“人还在、心不死”的复辟思想，梦想恢复失去的天堂；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应该“永世不得翻身”。

受到这位难友的启发，我想起了我做过一个梦：一天中午午休，仿佛听见铃声，一看手表，两点已过，我赶忙拿起书本，奔赴教学大楼，在走过大操场时，响起了上课铃声，我想：糟了，学生们都在教室站立，等着我，推门、站到讲台中央说“同学们好”，这起码还得有

五分钟才能赶到，我急得浑身冒汗。又一阵当、当、当……的钟声，把我惊醒，看见大家都在拿着锄头、扁担，准备出工，原来这是“南柯一梦”。我叙述了这个梦境，说这就是我梦想恢复的“失去的天堂”。是一种变天复辟的幻想，今后唯有老老实实改造，彻底消灭这种幻想，方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当然，这不过是虚应故事的检查批判，但是这“梦想”、这“天堂”却总也挥之不去。有时还觉得这“失去的天堂”在向我招手。

文革期间学校都停课闹革命去了，后来毛泽东又说了：“大学还是要办的，我主要指的是理工科大学。”于是有了1973年（张铁生交白卷那次）全国招生考试。当时管理和改造我们右派的班主任胡某某，他的子女都插队落户在垫江农村，紧挨着我们学习班所在地的同兴岛，以便于照顾。他的女儿准备报考中级师范学校，要我辅导她的数学。我把她复习的教材拿来一看，初中代数，这当然只能算“小菜一碟”，我午休时翻看15分钟，晚上就可以给她上课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太老实了，不懂得“讨价还价”。我为什么不提出每次需要半天备课呢？我若提出，是肯定会答应的，我也可以在那超重的体力劳动情况下，得到一些休整。

后来，胡某某也给了我一个回报，当年的探亲假多批了一个星期，并且对我说：“我家就住在望龙门，你路过重庆，可以住到我家里。”

1975年，复出后的邓小平大力抓整顿、抓生产。煤矿学校把我们调了回去。我还是没有摘帽子的右派，就分配在总务科修缮组当石匠，砌堡坎。跟随石匠师傅一起干活。这比在长寿湖学习班的劳动轻松多了，一是没有什么定额，干多少是多少。文革，大家停产闹革命，玩了这些年，谁还会亡命地干？二是工间休息时间很长，一般40分钟，甚至一小时，不像在长寿湖卡得死死的20分钟，一分钟也不会多。反正一切看师傅行事。师傅说：“好，我们又摸倒起（重庆俚语：再把工具操起来接着干的意思）。”我们就跟着操起家伙。因为工间休息时间长，我就可以跑到图书馆去看报看书。

1976年毛泽东死了，“四人帮”被抓起来了，1977年邓小平再次复出。同年8月6日，在人民大会堂内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会议上，有人提出应该恢复高考，邓小平表示赞同，10月教育部决定恢复高考。我又一次感到那“失去的天堂”在向我招手。那时我还是单身汉一个，没有子女。我决定为右派的子女补课，帮助他们在这不受出身限制的、决定自己前途的竞争中取胜。不能再当“贱民”。

当时煤矿学校有4个右派子女准备报考。于是我白天利用工间休息时间备课，晚上我在自己的寝室，用一块食堂公布菜牌的小黑板为他们补课、出题、模拟考试、解析答案。他们是在文革期间读的小学和中学，正值毛泽东指责“考试是突然袭击”，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经历过考试，这样的训练对于当时的应考，无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当时，煤校的地质实验室管理员曾××有一个女儿准备参加高考，他找到我，想让他女儿加入到这4个右派子女的小集团学习。我说：“你看，我寝室只有这么一点大，来了4个学生，够挤的了，再加一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他说：“我有办法：我那个地质标本陈列室，原来是一间教室，黑板是现成的。我把地质标本都顺到四周靠墙，中间就可以坐学生了。”我无法拒绝，就搬到地质标本陈列室去辅导了。

那时很多家庭都有下乡的或待业的知识青年，前途茫茫，不知何往？现在有了“高考”这个可以用自己努力来争取的前途，犹如漫漫黑夜中看到了亮光。但是，很多人又被那可恶的“文革”耽搁得太久，学过的东西，忘光了，急需有人辅导。本来煤矿学校应该不缺这样

的辅导老师，可是，大家才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教师中业务好的都害怕再来一个什么运动，搞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者“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就划不来了。很多职工的子女想参加这停了10年的高考，找不到辅导老师，一听说有个打石头的右派，原来是教师，在地质标本室为右派子女补课，都纷纷跑来听。多的时候达到二十多人，甚至有沙坪坝的也跑来听。这一来，真是“对着窗户吹喇叭，鸣声在外”了。学校保卫科也知道了，右派是归保卫科管的。保卫科长找到曾××说：“李国元是右派分子，你怎么把地质标本室拿给他用？”曾××回答：“他是给娃儿们讲数理化，又不是讲反党反社会主义。娃儿们文化提高了，好考上大学，这是好事嘛。我的娃儿也在听，这关系我娃儿的前途，我怎么不支持？”保卫科长无言以对。曾××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我：“我把他顶回去了。”我的劲头更大了。因为我就是要用事实证明：把我弄去抬石头、打石头的所谓劳动改造二十余年，实实在在是糟蹋人才、浪费人才。

中断十年后恢复的第一第二次高考，煤校的右派子女有三人考上了大学。那些跟着来听课的，多不认识，我也没有去打听还有那些人考上了大学。其实，考上大学主要是他们自己的努力，我不过助了一臂之力。

第一次高考录取名单公布不久的一天，中午在食堂打饭，往日对我冷若冰霜的一个女图书管理员走到我面前对我说：“老李，今晚6点，请你到我家吃晚饭。”我受宠若惊，问：“为啥子？”“我女儿考取了四川农业大学，她跟着他们听了你的辅导课，感谢你！”晚餐就在她家里，炖了一只鸡，外加几样家常菜。这是比今天在任何豪华大酒楼办的谢师宴都令人难忘的一餐，因为我当时还没有摘掉右派帽子，还是阶级敌人呐！这可是她勇敢地扯下政治面具的真心诚挚的表白。

1978年5月，中央下达了全部摘去右派帽子的11号文件。大会传达文件后，宣布我回教务科分配工作。教务科把我分到数学教研组。数学教研组分配我替一位姓杨的老师批改作业，这位杨老师1959年参加工作，比我晚4年，我有些不服，说：“为什么让我帮他改本子？”教研组长说：“他教了3个班，任务重，作业本改不过来。”我说：“既然任务重，那——拿一个班给我上课好嘞。”他问：“已经教到高等数学那部分了，行吗？”“没问题，只需给我两个礼拜备课。”虽然我以前教的是力学，但是，我相信我的实力。

两周后，我又夹着书本，正式重返讲台，恢复了“失去的天堂”。

啊，我的“天堂”！

（2011-12-25 修改稿）

长寿湖“右派”的文革遭遇

李普杰

按：本文作者李普杰，是四十年代后期陪都重庆的学生运动领袖，中共地下外围组织“六一社”在重庆清华中学的领导成员。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在共青团重庆市委学校少年工作部副部长任上被打成“右派分子”，贬到长寿湖渔场“劳动改造”。

文化大革命之前，在重庆长寿湖“劳动改造”的“右派”，大概前后有三四百人，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就只剩下一两百人了，因为其他的陆陆续续换地方了，有的“摘帽”后调回去了。比如学校的教师“右派”，只要摘了帽子，在农村有一点关系的，就一律遣返到农村去，没得地方去的才安到长寿湖，送给长寿湖作工人（劳动力），但不是正式工人，只在那里劳动就是了，只发生活费。其他机关单位，各个机关不一样，有的单位是把摘了帽的人调回去了，有的还是留在长寿湖，由单位管供给，在长寿湖安排劳动。我们团市委系统的都没调回去，通知摘帽的同时就同时发给你另一份通知，你成为渔场职工了。留在渔场的人，有的安排当队长，有的安排当组长。好像是让你回到了人民队伍，但是实际上还是被监督劳动的对象。

特别是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过后，渔场加强了对我们的监管，劳动强度也增加了，抬石头，修堤坝，甚至于给人家出卖劳动力，像化工研究所，给它修房子，找点钱——给长寿湖渔场找钱。我们当时主要就是修鱼池，修了几个外荡。那个劳动量是很重的。摘帽不摘帽是一样的，只是管理上稍微有点区别，那个区别很微小，从总体上讲都是一样的，只是没摘帽的管得更紧一点，摘了帽的，比如星期天可以赶场，上个街，没摘帽的连赶场上街都要请假。其他方面基本上是一样对待，劳动都是一样的重劳动。白天劳动，晚上学习，接受批判。我们那时看不到前途，只希望最好能调回城里，和家人在一起，也不要想当干部了，就当个普通劳动者。

文革一来，我们就又跟没摘帽的“右派”一样，什么权利都没有了。

我们在长寿湖经历文化大革命，大致可分为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文革初期，我们成为“横扫”对象。

文革刚爆发的时候，我们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报纸也看不到，广播也没得。通信还是有的，我有一段时间负责给大家收发邮件，就是直接到邮局去取信，没得人检查。但是家里的人也不敢写什么，也不敢寄传单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这些人就成了横扫对象。我们感觉是突如其来的，就把我们全体弄到狮子滩场本部去开大会，主要批斗对象都是我们这些人，还有职工中有比较突出问题的，实际上是抓“死老虎”，有的就戴高帽子，弄到狮子滩去游街……

当时渔场搞运动，依靠了职工中的一批学生，这些学生有几部分，一部分是五八年、五九年，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或其他问题不能升学的，调到渔场来；还有一部分是招的知青，因为“大跃进”时的下放干部都走完了，渔场的许多工作需要有人继续干，就招了一部分知青职工；还有一部分是儿童院来的孤儿，长大成年了，不能再呆在儿童院了，就安排到渔场来工作。渔场依靠这些学生来整我们。

“破四旧”的时候，这些学生来抄家，我们那时在渔场其实并没有家，抄家就是抄宿舍，乱抄一气。我有两本书，一本《苏联共产党史》，一本《资治通鉴》的简编本，被他们抄到后，认为是“封资修”。他们也不懂。还有的被抄到马克思的像，还认为是收藏了外国人的照片，也不得了。还有的女士箱子里抄到高跟鞋，其实人家早就没有穿了，哪里还敢穿？只是舍不得丢掉，抄出来就说是怀念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把高跟鞋给人家挂到颈子上示众。

当时这些“右派”生活条件很差，住的地方窗子是没得玻璃的，都是用报纸来糊上挡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报纸，没得哪张没有毛主席的像，就为这个事情，靠近窗户住的人就要被拉出来批斗，说你把毛主席的像用来糊窗子，就当一个大逆不道的罪状来搞。所以当时横扫那一阵，我们根本就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糊里糊涂的。

这段时间过了，主要就是组织学习了。一天就是叫你坦白交代。另外劳动是照常，而且是加强劳动。那个时候就不修鱼池了，我们在同心那个地方，到荒山包包上去开荒，修路，准备种果树、种粮食了。白天劳动，晚上就要学习，晚上学习随便找个理由，批判呀，检讨呀，哪个又反改造了呀，哪个又有啥子问题呀，总要找点东西来批，甚至于劳动之余，开玩笑的内容也拿来批判。这一段时间大概维持了几个月的时间。

我们经历的文革第二个阶段，是造反派起来后，场部领导瘫痪了，我们的日子相对好过一点。

渔场职工造反后，去忙他们的事去了。对我们的监管就松下来。对我们这些人只是管着，随时把你敲打着，让你不出问题就行了。本来对这部分人管得很严，像喂猪、喂牛、厨房这些事，这些人都不能去做——怕你搞破坏，认为都是坏人嘛。但是等到那些职工和学生都造反去了，他们就不干这些事了，所有在渔场里边的喂猪、喂牛、喂人（厨房）这一切必须有人每天做的事情，统统都交给我们这些人顶起来干了。

在这一阶段中，也有让我们恐惧的时候。有一次，有“八一五”的学生来，把我们集合起来训话，完全不把我们当人，说的是：你们这些牛鬼蛇神，抬起你们的狗头，竖起你们的狗耳朵，听着！老子是八一五！……有一个没有摘帽的“右派”郑杰，人很老实，大概是头低得不好，被旁边一个学生拿把镰刀顺手往他头上一下，血马上就流下来了。

我们那里本来是个半岛，一涨水就成了孤岛，周围都是水，只有枯水时才可以走出去，平时都只能划船出去。外面的人要来，一般都是坐机器船来。来了，把我们训一顿，批斗一顿，搞点吃的走。就像鬼子进村一样。所以我们那时候最怕听到机器船响，机器船一响，就心惊肉跳，知道外面来人了，不晓得又要搞什么名堂。

造反派批判“走资派”的时候，也会把我们连带着批判一下，说渔场领导让我们摘了帽的人当队长组长，是对这些人的政策右了，依靠了这些人，上纲来说就是“招降纳叛”。还有摘帽后留在渔场当队长的，像市委组织部，监委的，顾学义、陈宇这些人，他们摘帽后留在渔场当干部的时间长一点，大概是当了一年两年的队长。你当队长就要管那些学生，管那些职工。管了，好，现在那些人起来造反了，就算他们的账。就说他们如何执行了领导的黑指示，如何打击迫害了革命群众等等，就清查、批斗这一部分人。

当时渔场把我们分了几处，凡是关系还没有转给渔场的，就一律留在同心，算是代管。我们留到渔场的，分了两部分，一部分原来是主要当干部的，就留在先锋，专门作为一个生产队，大概有二三十个人。另外一部分就弄到飞龙，飞龙更多的是教育系统甩给渔场的人。我们就集中到飞龙去了。管理还基本上是统一的一个格式，随便派个人就把我们管了。我当时开了个玩笑说：我们这样的人好管，派个三岁娃儿来当我们的队长的话，照样把我们管得好。为啥子呢？我们又不敢说啥子，喊我们做啥子就做啥子，那还不好管吗？他们派来的人，开头还稍微派得认真一点，后来乱七八糟随便派个人来都可以，只要把我们看守起来，管劳动时，把劳动加强一点，晚上有理无理开两三个钟头的学习会就行了。只要没有出大的问题就行。

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先是一切情况都不了解，不晓得搞啥子名堂，大字报也不准我们看，街也不准我们上了（因为街上也看得到报纸）。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慢慢了解了一些动向，特别是我们这些摘了帽子的，我们认为自己是叫做“回归了人民队伍的”，我们也要求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要别样，我们就要求学习，要求了解情况，要求了解形势，“关心国家大事”。但这个要求开始是达不到的，于是我们这些人就自己主动起来要求，像

我们在飞龙这几十个人，明确提出要求：我们应该有权利参加文化大革命。根据我们当时得到的政策，因为我们是摘了帽子的，回归了人民队伍的，我们应该享受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但是我们也不要要求造反，我们不造哪个的反，因为这点我们心里明白，我们只要求学习、了解，要求也能参加一些活动，这个活动不是别的，是我们自己的学习活动。就这样一个要求。

渔场在文革前调了几个摘帽的“右派”到大洪湖去，朱培德就是一个，在那里当队长。他们那边不像长寿湖这样闭塞，了解外面的情况。朱培德就跑来串联，说我们摘了帽的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

当时重庆市里有一个叫做东方红 11·16 兵团的群众组织，大概就是专门为这些历史上受冤屈的人鸣不平、搞翻案的，朱培德就跟这个组织里的人有联系。这个组织的人也曾经派了人到长寿湖来，专门把集中“右派”的飞龙、先锋、同心这三个点（除团山堡那个点以外，因为那里集中的是其他各种“分子”，大家觉得要复杂些），把这几个“右派”点的人集中起来，曾经开过一两次会，鼓动这些人参加文化大革命。

我们那些人就商量，应该找上面问一下，我们“摘帽右派”可不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应不应该有人民内部享有的那些权利。我们那里的人就推选我为代表，让我到省里面去上访——那时已经成立了省革筹组。场部当时已经是造反派掌权了，他们也不完全拒绝我们的要求，也不作明确答复。

我被他们选成上访代表后，我一个人不愿去，我当时长了一个心眼：我一个人出去，人家以后来说我搞了什么名堂，我怎么说得清楚？我就拉了一个学生队派到我们那里负责的，算是我们的队长，我就把那个队长拉到一起，我说要出去我们两个一起，这个娃儿也比较单纯，他也表示应该支持这个事情。他就跟我两个一道，在场部开了介绍信，到省里面去上访。

我们到成都找到省革筹，接待人员听了我的反映，明确回答我：摘帽后就恢复了公民权利，可以跟全国人民一样参加文化大革命。

跟我一起去的那个学生问过我：一九五七年打右派，现在看来是不是错了？我很谨慎，就说：打右派没有错。只是我们摘了帽的应该算人民内部问题了。我们知道“右派”的案是不好翻的，不要去碰。

我去上访，队上的人写了张大字报，贴到狮子滩场部，说“我们杀出来了”，这一下惊动很大。本来我们那个队叫飞龙队，飞龙是老地名，文革“破四旧”的时候，改了个新名字“要武”，就叫要武队了。“要武队杀出来了”，这就不得了。后来清查、批判了好久，说你们“要武”，要“杀出来”，要杀到哪里去？想干什么？想翻天吗？其实那大字报也没有其他意思，就是说我们摘了帽的应该有公民权利，应该有权参加文化大革命，“杀出来了”就是用当时的时髦语言表示要出来参加文化大革命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因为确实没有其他问题。

我们还把渔场的书记拉去开过一次会，也不是批斗他，就是要他向大家说清楚，把我们已经摘帽的仍然当成“右派”对不对？符不符合党的政策？是谁指示的？他也只是笼统地回答了一些大道理，不说实质问题。这就是后来追查我们所谓“造反”、批斗书记的事。好在我们也没有打他，没有对他有什么格外的行为，所以追查、批判了我们几天也不了了之。

我们那里也有个别人要翻“右派”的案，比如卢光特，他是老地下党，他一直认为自己被打成“右派”是错的，一直不服，这时就起来翻案，跑到成都去上访，住到四川大学，川大八二六的帮他翻案。后来他当然被揪回来批斗，大会小会批斗，整了好久，还说他是“五一六”。

其他凡是不大认罪，也经常是要挨斗。像周西平是摘了帽子的，他的爱人给他写信，有时透露一点外边的消息，他也就随便透露一点给其他人，这样子就传播出来，被知道了，就批斗他，还把他弄来吊起打，吊他的绳子又出了问题，把他吊起又摔了下来……还有没有摘帽子的几个人，像李恩章，梅吾，他们这三四个人，一直不承认是“右派”。这几个人是经常没得斗争的就斗他们。只要稍微有点不如意，就批斗他们。这就是当时学习活动的一个人主要内容。

在我们飞龙队，二三十个人当中，有三个没有摘帽子，其他都是摘了帽子的。这三个没有摘帽子的都是教师，他们就比我们的日子更难过了。我们吃的水，是从湖边挑上来的。枯水月份，特别是冬天，水退了，从湖边挑一挑水，大概至少要有五六百公尺远，还是个上坡路，整个挑水都是他们的事情。冬天冷起来了，有些事情如打柴、打猪草，也是他们的事。反正最孬的差事，劳动最重的，就是安排他们三个人。而且一开起会来，首先就是抓这三个人。

尽管当时社会上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还一直在宣传“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心是有数的，认为这个“右派”问题不好翻，现在形势看不清楚，不能去碰。右派就等他右派，我们是摘了帽子的，我们只要求按照摘了帽子、回归人民内部处理，当时我们提出要“参加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想享受一个人民内部的、一个普通公民的待遇：我们工作能不能自由？我们能不能回去与家人团聚？我们能不能还是在长寿湖被管起？能不能离开这个场地？……那时候也不图什么了，也更没想到将来还当什么干部，只想跟家里的人团聚，儿女、老婆在一起，自己过点平静的、老百姓的生活。哪怕是劳动都可以。这种想法是很多人的，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那种阶级斗争形势下，实际上多数人就有了这种心态。

造反派武斗起来后，渔场的两派也忙着打内战，一会儿你把我赶出去，一会儿我把你赶出去。只随便派个人来管我们。两派都不大敢挨我们的边。因为挨了我们的边，互相之间就要抓辫子。我们那段时间很轻松，劳动没那么紧张了，只是维持那些日常必须的，比如喂猪、喂牛呀，煮点饭呀，这些正常的劳动，平常坡上的劳动就减轻了。这段时间我们消闲了一下，很多人就借这个机会，请假各人回家去耍。有的人回家去耍个十天半月，甚至三五个月的也有。

文革中我们经历的第三个阶段，是造反运动停止了，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过后。

秩序恢复正常过后，生产也恢复正常了，我们这些人劳动又加重了。又是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天天都学那几篇毛主席著作，《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呀，《矛盾论》呀……其实管我们的人自己都没学懂。比如说学《矛盾论》，明明讲的是矛盾可以转化，你要是这样说，就要挨批判，说你还不认罪，你这个花岗岩脑袋，你还想转变哪？学习就是搞这样一些无谓的“思想斗争”，文革的后半截，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状况。这个时间维持得比较久一些。

那个无理的批斗到什么程度呢？也包括我们这些人自己互相斗，因为有的人要想挣表现，有的人当然规矩一点。我们有个练冰吾，平常爱说调皮话，有一次挑粪施肥，走到厕所，他就讲，中国这个厕所的名称，有多种多样的，有的农村里头叫“茅厕（注：读司）”，还有的叫东池……他本来随便一讲，也是无意，但是紧接着就有人汇报上去，说他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毛、泽、东：茅司、厕所、东池。就这么一联想一上纲，就成了他的罪名。斗了之后不说，把我们弄到狮子滩去开大会，大会上就有人点名，说有个练冰吾，反动极了，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为现行反革命要把他抓起来。就抓这些事情。

我们那里有一个摘了帽的，他为了挣表现，劳动时把我们管得太紧了，所以平常大家对都不满。他因为得罪了造反派，成为挨斗对象过后，我们这些人对他也不满意，批斗他时

也就有点火上加油。比如他有一次在工地上劳动时说：哎呀，今天怎么没有看到《红旗》呢？——《红旗》杂志那几天没有来；有时他说台湾有槟榔之类的几大特产……到算他的账的时候，就说他最反动，曾经说我们没有看到红旗了，红旗都不见了；他怀念台湾，他一心想到台湾去，就吹台湾有什么特产好……就这样给他上纲上线，也来批斗一通。自己乱斗一通。反正凑那个场面。晚上必须要把那两个钟头想办法凑足批判内容。

我们这些人，任何时候都该作检讨，打倒刘少奇了，说我们是刘少奇的阶级基础，要清理我们跟刘少奇的关系，要我们交代对刘少奇是个什么态度，要检查我们过去是如何依附刘少奇的。打倒林彪了，我们又是林彪的社会基础了，又要清查我们和林彪的关系，没有其他关系也要交代和林彪那些言论的关系。清查五一六，本来是造反派内部的事，也要到我们当中来找五一六，我们当中哪些人与五一六有没有关系，就是没有组织关系，也要查思想上有没有什么关系。卢光特当然就被当成五一六来批判了。

这段时间，我们这些人慢慢把形势也看得更清楚一些了。对这个文化大革命，晓得与我们无关，没得我们的份儿，我们也不可能在里头捞到啥子。你要卷进去呢，你只有走不脱的。所以我们就不参与，只是各人自己能够逍遥一点，能够自保就好。对形势也看得更灰一些了，觉得我们没什么前途了，一辈子也就是如此了，没有出头之日了，就在这里劳动一辈子。与家人一年能够团聚一次，就算好的了。

我们那个地方与世隔绝，一年只准在春节期间回家探亲一次，二十天左右。还不一定放假。说不放就不放。每年到放假之前都提心吊胆，究竟今年放不放假呀？要到临时才宣布。为了这一次回家，每年到十月前后，就得忙着准备带回家的年货，去赶场，买点鸡、鸡蛋之类的东西，鸡买了交给农民家帮忙喂着。买点鱼来做成干鱼。力求在回家时能带点副食品回去，让家人改善改善生活。我们在飞龙，隔狮子滩比较远，有六十多里水路，要坐船出去。1969年春节前，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没听说不放假，到了时间，大家就约好一起回家。下午还要上班，大概四五点钟提前下班，自己划起船到狮子滩，半路上有从外面划船回来的人，说你们走哪里去呀？我们说回家呀。“你们回啥子家哟，不放假了！”我们一听，急了，怎么办？反正我们没有得到正式通知，装做不知道，一走了之。于是大家到了狮子滩，天已经黑了，也不敢住下，大家又赶到前边一个乡场邻封去住。到了邻封，有人又说不能住，万一场部的人晓得了，追到邻封来了呢？干脆，走！完全是夜奔哪，从长寿狮子滩，一直走到长寿县城，二十八公里路程，背上背的，手上提的，再累也不敢停下来。走到长寿县城后，成中霖累得来上厕所时蹲下就起不来了。

所以在那个地方，文革后面那几年，比起前期最紧张最恐惧的时候，显得是松活一点，但是仍然像在坐无期徒刑的监牢一样，在我们的心理感受上和无期徒刑没得什么区别。

后来周恩来去世的时候，我们还感到惋惜。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我们就暗自感到高兴了，觉得这下好了，他死了，以后可能会有变化。但是都没想到会变得那样快，当有关“右派改正”的消息传来时，我们都还不大相信，以为只是少部分会得到改正，我们那些人里面有的就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像詹光、梅吾、李恩章他们，最多一个死，就是打死也不承认是“右派”。但是没想到一下子全部都“改正”了。

一个“摘帽右派”被卷入文革的经历

林向北

为华蓥山游击队“翻案”

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把亿万中国人民都推到狂热的火山口。他提出了“造反有理”的口号，可是要造谁的反，怎么样去造反都没有指明，反正响应号召“造反”没有错。因此，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工农兵学商，都天不怕地不怕地造起反来。

当时有句口号对我们很有吸引力：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我岳母陈联诗（我习惯称呼她“诗伯”）曾经战斗过的华蓥山游击队。从1926年的军团冲突开始，中间经过迎接红军的1932年起义，直到1948年的迎接解放的武装大起义，华蓥山区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军阀、地主、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武装斗争，许多党的干部和游击队员壮烈牺牲，人民遭受了深重的苦难。可是建国后，由于对地下党的偏见，再加上地方上不明真相的习惯势力，一直认为这是一支土匪队伍，好多游击队员和家属也一直被当成土匪和土匪家属，被作为革命的对象打击迫害，甚至流离失所，妻离子散。诗伯在世的时候一直为此奔走呼吁，要求恢复华蓥山游击队的本来面目，可惜壮志未酬，她自己的党籍都没保住，强行“劝退”了。现在作为游击队的后代，作为这支队伍的领导人的后代，我们理所当然地要把这段“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要造反，就要有个组织，就像全国风起云涌成千上万个造反组织那样。我们这个组织起了个名字，就叫“华蓥游击战团”。有了组织还要有个刊物，我们为刊物起名叫《华蓥怒火》，刊头是由刘孟伉伯父亲笔题写的，他既是当年诗伯的老战友和崇拜者，又是川东游击纵队的司令员，还是全国著名的书法家，于情于理于公于私，都为刊物增光不少。刊物的第一期刊出了《华蓥战团》成立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要为华蓥山游击队及死难烈士和游击队员及其家属平反。特别是在有一期的《华蓥怒火》上编了100例事实，来揭露“走资派”迫害四川地下党及其所领导的武装斗争，以及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在“反右”中大整地下党员的情况，这些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的荒唐事例，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纷纷给以转载评论。

与此同时，我们还在成都、重庆、岳池、广安等地访问了200多位知情人士，其中有当年四川省的负责人和一些游击队员及其家属、游击区的群众，有廖玉璧、陈联诗的亲友、邻居，他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情况，并献出了当年保存下来的珍贵文物，为了表示慎重起见，他们对所谈的材料都盖上私章、手印，我现在还保存有很多这样的访问记录材料。

当时我们家很穷，采访不但辛苦，遇到不少危险，而且交通不便，为了投亲靠友，解决吃和住的问题，每天要走上数十里路。其时正是武斗期间，各派都在路卡上站岗放哨，也不知道是哪一派的，稍微问答不对头，就要吃苦头。宁君和我去岳池县的罗渡溪，那里正有敌对的两派在打仗：一派要为游击队平反；一派说游击队就是土匪；我们怕找错了门路，在一个田边躲了半天，最后才找到一个老游击队员的家属，把我们引到中和镇宁君的家乡。

总的来说，几次调查访问都是顺利的，没想到回到重庆，宁君与她弟弟亚彬大吵了一架。

亚彬说：“有人正在说我为父母翻案。现在正要考虑我进‘三结合’，我不能让人抓住把柄。父母的事情只要时机成熟了，组织上自然会考虑解决……”

姐弟俩话不投机，宁君气冲冲地到文联野谷家去了。

宁君回成都后，就根据过去所掌握的材料和这几次调查所了解的情况，整理成书面材料，上京向中央文革小组告状，谁知走错了庙门，中央文革也不准“右派翻案”，当然毫无结果，空手而归。

尽管我们又一次希望落空，但通过这一系列采访，我们掌握了大批珍贵材料。打倒“四人帮”之后，上面提出了“拨乱反正”的口号，各地开始了清理历史错案的工作，1983年由岳池、广安、武胜、华蓥市党史部门联合组成的“三十年代华蓥山武装斗争编写组”，花了三年时间，写成了一本书，肯定了华蓥山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一支武装队伍，同时在岳池、广安党史刊物上写出了廖玉璧、陈联诗传记，也肯定了他们的革命活动……这些成果与我们提供的这些资料是分不开的。

1982年6月，岳池县正式向我们颁发了国务院给廖玉璧的烈士证明书。

建立传单交换站

我这个人一向是不甘寂寞的，觉得在这样的“革命形势”里，除了写“申诉”，自己还应该“有所作为”——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看到市面上各派造反组织发的传单满天飞，虽然是内容无奇不有，消息形形色色，但是每一家的信息渠道和宣传内容都有一定的局限，如果把大家的传单都集合起来，内容不就会丰富得多也全面得多吗？于是就想搞个传单交换站。

说干就干。我每天骑上自行车，先到那些大的造反组织去收集传单，然后带回家，集中起来，根据下设“联络点”的多少，分成十几二十堆，下午就有另外一些造反组织到我这里来取，同时也把他们的传单带过来，第二天再由我分发出去，互相交换——当然了，这其中也有我们办的《华蓥怒火》。我家的“交换站”，果然大受欢迎：各个造反组织都想把自己的信息尽快传播出去，同时又可看到外面的信息，增加见识。“生意”越兴隆，我的干劲就越大，有时自己忙不过来，就给孩子们分摊些任务，一家人都卷入传单交换站里，忙个不停。

当然，我们是有倾向性的。因为我们是兵团、826观点，主要收同观点的材料，有时也收些其他观点的材料，以作“批判”用。

有一个老战友的爱人姓吴，当年是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又是中共外围组织的成员，在重庆学生运动中，是“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的积极分子和领头人，建国后是川棉一厂有名的“女状元”，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文革一开始，全厂内外的大幅标语都是出自她的手笔，现在成了我们造反的“亲密战友”。她不但文章写得好，蜡纸也刻得又快又好，而且油印技术也好，一般人刻一张蜡纸只能够印几十张，她可印上150到200张，印得清楚美观，送到读者手里，人人称赞。

因为要等她把传单刻印出来，我往往是深夜才能够往回赶。有一次，我骑车到猛追湾，前面有两个站岗放哨的造反派将我拦住，问我是什么人，为何深夜还在街上转。我说是去看一个亲戚的。一个人忽然看见我车后夹的布包，就问是什么东西。我说：“是人家叫我带给二医院一个病人的，我不知道是装的啥子。”那人不相信，抓过布包要检查，我心里暗暗着急：因为这个地方，常常会碰上兵团的死对头——东郊“红卫东”的人，要是遇到的是他们，看见是兵团派的传单就麻烦了。谁知道那人一看传单，笑着说：“误会、误会！以后不要太晚了。”原来他们都是“兵团”的，我才松了一口气。

“华蓥战团”的油印刊物《华蓥怒火》，都是先前为我们刻印陈联诗回忆录《华蓥风暴》的钟开林刻印的。当年他在川大也是刻蜡版，收入微薄，虽然那时为我们刻一张蜡纸只有四

毛钱，但一天能刻上三四张，也对家里有所补助。在文革中，我们把他也吸收进了“华蓥战团”，《华蓥怒火》的刻印，全都交给了他。开林为人老实，工作刻苦认真，字也写得好，每次总是按时刻好，有时还印好送来。我们两家常走动，成了好朋友。他家院子里有一架茂盛的“白玫瑰”葡萄，每当葡萄熟了的时候，我总要去他家吃个够，还要带回一些给孩子们吃。后来，通过他夫妇的介绍，开林的小弟开友就与我的大女儿抗美相识相爱，直到结婚，对开林的称呼，也由“叔叔”改为“四哥”。

我家成了“牛鬼蛇神”接待站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一大批老地下党员也还像我一样，抱着“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的决心，从全川各地来到了成都，住在四川大学。这个学校有几个学生是地下党的后代和亲戚，他们组织了一个“826 联合调查组”，专门调查四川原地下党受迫害的情况。

在调查组的重点调查对象中，有一批解放后曾经身处高位的地下党员，如原川西行署秘书长杜桴生，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文澄，副部长陈孟汀、王匡时，万县专署副专员赵唯，达县专署副专员熊曙东，重庆市委秘书长李止舟，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廖伯康，《红岩》作者罗广斌、刘德彬，泸州专署副专员廖林生等。初步调查的结果是：解放后任县级以上地下党员，除了打成“反党集团”之外，百分之八十以上都被打成“右派”，除一般右派、极右派外，还有暗挂右派、先天右派、公摊右派、抓阄右派，未打出右派的单位的领导就定为右派……总之，当时真是随心所欲，看领导的“高兴”。对那些不低头认错、认罪的，一律被认为态度恶劣，打成“极右派”，送往山区劳教，十之七八被整死、饿死、病死在那里，以后连骨头也找不到。像我这样的“右派”，从受苦受折磨的程度上看，简直排不上号，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24

从四面八方来的“难友”们相会在一起，大家感到当年没死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和屠刀下，解放后也没被那些有权有势的“左”王爷们害死，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当时都有一个乐观的估计：这回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号召，要我们起来造反的，一定会给我们第二次翻身求解放的机会，于是大都忙着写自己的申诉材料，早日送上去，争取早日获“解放”。由于前景乐观，大家总是高高兴兴的，只要哪个身上有钱，都要他作东道主请客，痛饮一杯。特别是赵唯，熊曙东，一天不饮酒就过不去，此情此景，又回到建国前那种“穷快乐”的地下生活了。

我这个好客之家是久负盛名的，在文革中更是表现得“登峰造极”，来自四面八方的亲戚朋友，特别是地下党的老战友，或者是被斗来斗去，在原地呆不住；或者想躲武斗，都往成都跑。他们一到成都，就要来我家“报到”，有的是来相会问好，有的是为了了解情况，有的是希望我帮助解决些问题，也有不少是来找住处的。不管是何原因而来，我都热情接待。当时我同宁君两人的工资 124 元，还要管 5 个孩子的生活，其境况困难可想而知。但我不能叫穷，打肿脸充胖子，住的一楼一底三间房，平素自己家里七个人都紧张，可是客人来了哪怕是咱们自己暂住别家，也要腾出来给客人住。因来往人太多，若干年后，常有朋友说：“我来成都住在你家里，你就记不得了？”我确实记不起来了。

钱不够用，孩子们就想办法。大女儿抗美带着妹妹们，去卖报纸。各家造反派都办得有报纸，大张的四分钱一份，小张的两分，还有一些小册子也是五分六分的，每卖一块钱，可以得一角五分钱的劳务费。天晴下雨，刮风落雪，几个女儿都上最热闹的春熙路，分成两个

摊往街口一站，就开始吆喝，最多的一天，可以卖到 400 份，一个月下来可以得五六十块钱，在那萝卜两三分钱一斤的时代，这可是个大数目啊！

后来机关里斗争我时说：“你家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牛鬼蛇神接待站。”同时拿出一份名单来，我接过名单一看，居然有 151 人！这一百多人有名有姓，确实来过或住过，他们怎么了解得这么清楚啊？专案人员又说：“你心好狠啊，把孩子的肉票都要拿去招待那些牛鬼蛇神。”

我说不出口了，眼泪不住的流了出来。

我成了“三老会办公室主任”

正当我们兴高采烈，准备迎接“第二次解放”的时候，忽然又是风云突变——1968 年 3 月 15 日，中央首长“三一五指示”发出了，其中，江青在讲话中专门说到：“华蓥山游击队糟得很，叛徒太多了。”一时间狂风又起，满街的人抬着领袖大像，高举红旗，敲锣打鼓，满街的标语、横幅红成一片，欢呼中央首长的重要指示，大揪地下党的叛徒……把我们的“美梦”击得粉碎！

1968 年 12 月 28 日这一天，终于大祸临头了。

这天上午，我抱着一大包白纸，前往省文史馆，请刘孟伉伯父写几张“四个伟大”，和毛主席诗词，准备用染成颜色的细沙子和胶水贴在纸面上，以表示对领袖的“三忠于四无限”。刘伯父写完字后，忧心忡忡地对我说：“向北，情况不妙，你看了最近报纸上的消息了吗？要出事啊……”停了一下，他又接着说：“昨天你们单位来人了解你的情况，你要小心，要做好思想准备啊！”

25

谁知这一次见面竟成了与刘老的永诀。就在这天下午，全市一齐动手，把我们这批早已列入黑名单的所谓“牛鬼蛇神”，一齐关进了牛棚。我所敬爱的孟伉伯父也不例外。

我们的牛棚设在电管局机关内，男牛棚在总工程师办公室，里面关着的是局的各位领导和以总工程师为首的技术权威，及一些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再加上我和余寿山两个“右派”死老虎。另外一个牛棚设在政训室的旁边，这叫“女牛棚”。宁君当然是其中的“重犯”。

进牛棚后的第一审，就是要我交待参加“三老会”的罪行活动。这真叫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所谓“三老会”，也是“三一五指示”中提出来的“反动组织”，指的是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组成的一个搞翻案的“反动组织”。后来才知道，原来根本就没有“三老会”这个组织，是那些专门整人的家伙，根据成都一个由老干部组成的造反组织——“七一联络社”，虚构出来的。

提起“七一联络社”，就不能不提到程占彪。程占彪何许人也？四川南江人，1934 年参加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延安，在王震任司令的卫戍司令部当参谋长，临近解放时又调任进军四川的川干团参谋长。建国后，历任重庆企业局局长、四川省政府副秘书长等职。在文革中，他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组织一些老干部共谋国是，在这些老干部中，也包括老红军和老地下党员。我在重庆时曾与程占彪有接触，也曾经受朋友之约，参加过他们两次座谈会，大家口口声声说的都是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毛主席又有了什么指示，我们又应该有什么行动，哪里会反党反毛主席啊！

自从中央首长说了要镇压“三老会”，四川各地特别是成都、重庆，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不管你做了什么，只要是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统统列入黑名单，带上“三

老会”的帽子。一时间，“三老会学习班”、“三老会集训队”、“三老会反省院”、“三老会劳改队”等各种形式的牛棚马棚应运而生。

在审问中，我既不承认有什么“三老会”，更不承认加入过。我只是把与程占彪召开的两次座谈会如实谈了。专案人员当然不满意，后来干脆造谣，说我是“三老会”的办公室主任。

“战友”翻脸来抄家

“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声号令，当时各个造反组织都想在这个问题上表示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连一向保护我们、甚至为地下党摇旗呐喊搞翻案的川大 826 派，也无情地反友为敌了。

我同宁君被关在机关的“牛棚”里，大儿子民涛在昆明的学校里“闹革命”，只有抗美带着几个妹妹在家，一看形势不妙，就忙着藏东西。首先是诗伯的那套口述记录本，先是藏在公共厨房废弃的柴灶里，后来又藏在地板下；还有诗伯的画，照片，各种遗物，《华蓥风暴》，我们到岳池、广安采访的记录本，各种会议的笔记本……最后连一套塑料皮精装的《毛泽东选集》也藏了，藏的地方上至屋顶天花板上的房梁上，下至公共楼梯的夹层里，就连床头挡板的层板都撬开了，放进了诗伯在 1926 年画的四张绢画。

果然不出所料，很快就来了抄家的。先是机关的造反派，抄了一阵没找到什么东西，悻悻地走了。然后就是“826”一个叫陈红兵的小头目，押着一个常常进出我家的川大学生带路，开着两部吉普车来了，翻箱倒柜，抄了满满两车东西走。当时已经是家徒四壁，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最心疼的是他们抢走的那一批书。那其中大部分是我们开始整理《华蓥风暴》的时候，每当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新书，责任编辑王仰晨就一次一次给我们寄过来，从 1962 年开始一直寄到文革前夕；还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沙汀要我们读《水浒》、《红楼》，我们就买了全套的《水浒传》，《红楼梦》，罗广斌说要参考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三红”，我们就去买了《红岩》、《红旗谱》、《红旗飘飘》，加起来怎么也有好几百册。另外我的五十多本日记也全部被抄走。我有写日记的习惯，建国前由于环境特殊，时断时续，建国后则从未间断，有时忙不过来，过后也要补上。这五十多本日记被抢走，对我来说是最伤心也是最惶恐的事情。

第一次抄家后没几天，陈红兵又带着一帮人来了，人人手里都有一支枪，威风凛凛，不可一世。抗美和他吵起来，陈红兵跳上我家的桌子，骂她说：“你妈老汉都是为华蓥山的土匪叛徒翻案！”三女儿林鹤指着他鼻子骂他才是土匪，陈红兵当胸一掌，把林鹤从屋里掀到了屋外，一个小年轻把手里的枪一横，枪口就对准了林鹤，抗美冲上去把他的枪往上一托，啪啪啪！一梭子弹直射天空，把那小年轻自己都吓得脸色发青。大门外围观的邻居们也吓坏了，吐着舌头说这女子，胆子好大啊！！

陈红兵带着人继续在家里翻箱倒柜，抗美趁着他们不注意，从邻居家翻墙出去，跑到三里路以外的警备司令部报案，说有一群人拿着枪在我家抢劫。当时正是上面要求军队收缴群众组织武器弹药的时候，警司马上集合战士，跑步出发。待到抗美回到家里的时候，那帮小土匪已经逃之夭夭。

苦中作乐的“三句半”

“三一五指示”之后不久，我被打成“三老会的办公室主任”，关进了“牛棚”。此时“运动”已经进行到了“中期”，批斗之类的事情大家都习以为常，懂得了苦中寻乐，所以日子过得也还悠闲。每天最重要的仪式，是“早请示晚汇报”。早上大家去到人来人往的食堂，在毛主席像前站成一排，低着头齐声朗诵：“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到了晚上，也得到食堂去站成一排，一个一个地对毛主席像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牛鬼蛇神跑不了，我也跑不了！”声音小了不行，念错了更不行。可是越是怕错越是要出错，一次一个“棚友”居然把“我也跑不了”念成了“毛主席也跑不了”，马上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抓起来，狂批滥斗，然后被罚去专门扫厕所。

“牛棚”里每天的活动安排，是上午劳动，下午学习，晚上一般自由活动，其中劳动是我们最向往的时光，通常是在机关大院里打扫卫生，大家有说有笑的，时间过得飞快。下午学习，事实上也是休息，指导员一来，大家鸦雀无声，低着头看“红宝书”；指导员不来，大家就摆龙门阵，说些笑话。笑话说多了，惹得我诗兴大发，为每个“棚友”都写了首“三句半”，拿当时时髦的话来说，算是“给牛鬼蛇神画像”。

有个“棚友”名叫田福良，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占区当了个“两面政权”的村长——相当于《地雷战》里的那个表面上为日本人办事、暗地里却为八路军办事的村长。村子里有个汉奸的老婆，怕男人的恶行得罪了八路军，将来没好下场，就暗地里向他献殷勤，送了几件花衣服给他的女人。此事文革中被查出来，就把他当成“日伪汉奸”来批斗，气得他在“牛棚”里整天闷着头抽纸烟，从不发言。我写了首“三句半”送给他：

“日伪汉奸”田福良，
偷了几件花衣裳，
每天只是把烟抽，
不开腔。

又有个“棚友”叫王国新，是个研究锅炉的专家，是从锅炉房里抓出来直接送进“牛棚”的。专案人员把他的名字倒过来，叫他“新国王”。我为他写的“三句半”是：

王国新来新国王，
胆大包天当皇上，
悬赏寻找窝藏地，
锅炉房。

又如总工程师吴锡赢，是我们四川电力部门高级工程师，工资高却又省吃俭用，攒下大笔存款，算是一个大“财主”。运动一来，到处都抄家，他吓得把金条藏在地板下，后来被挖出来，自己也进了“牛棚”。我给他写的是：

吴锡赢呀吴老总，
电力部门一富翁，
金条藏在地板下，
一场空。

这些“三句半”，很快在群众中广泛流传，文革后我们一见面，总要念上一遍，回忆起“牛棚”里那些荒唐的事情，大家灿然一笑。

文革中，我很热衷于写大字报，一来“炫耀”了自己的文笔，二来借此一吐胸中的闷气，写起来也很痛快。我的大字报就是自己写的检查，洋洋洒洒一写就是十几张，把整个宣传栏变成了我的“检查专栏”。要我检查“为什么要翻‘右派’的案”，我就先说当年事实上是怎么一事情，可是结果又成了怎么一事情，因此自己是如何如何的不服气，如何如何觉得很冤枉。然后就狠狠来一通“革命大批判”：这种态度不好嘛！身为一个共产党员，这是经不起考验嘛！因为是真是假组织上最终是会弄清楚的，自己怎么能去“翻案”呢？这不是成心破坏组织的威信，违背组织原则吗？……

有人说我这是“假检查真翻案”，可是群众很欢迎，说我的大字报“有内容，有嚼头”，又长又好看，是个“检查专家”。为此我曾经宣布，要去大街上摆摊挂牌，专门代人写检查，而且保质保量，不过关不收钱。

文革中互相揭发的大字报虽多，内容却多是些道听途说、似是而非的东西，又没人来追究责任，到后来谁也不把它当真，随便胡说造谣都没关系。有一天，机关里的老石给我贴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大右派林向北吃汤圆不给钱”，说的是有一次我在春熙路碰到他，请他去吃“赖汤圆”，我吃了三碗，他只吃了一碗，付钱时我才发现自己忘了带钱，只好由他付了二元钱。他由此很生气，以至于后来我要还钱，他都没要。文中写的时间、地点和天晴下雨，一样样都清清楚楚，不由你不信，但我却毫无印象。后来我问他：你的大字报写得那么生动具体，可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看不出来，你编故事的本领很强嘛。老石笑着说：他们知道我与你关系很好，不写过不了关啊！胡乱编点小事情，应付一下了事，我交了差，你上不了纲，大家看着有兴趣，一举多得嘛。

老石是工人出身的干部，五十年代我们在狮子滩修水电站的时候，他就与我的爱人廖宁君同在工会工作，到成都的机关后我们又是同事，关系处得不错。后来他夫妇因意外事故相继逝世，合葬在他的老家长寿，三年前我有机会去长寿，特意去到他们的墓前祭扫，以示怀念。

地下航线

以往的电影里一演到国民党审讯共产党，总有一些套话。比如说那“国民党”对“共产党”说：“实话对你说了吧，这些事情你的上级（或者是下级）都已经招了，你被自己的同志出卖啦！还为他们保密做什么？我看你还是说了吧！”“共产党”则昂起头，大义凛然地回答：“你们既然都已经知道了，还来问我干什么？”

没想到这些蹩脚的伎俩，被文革中的专案人员学到了。

他们分别把我和宁君关起来，先去对宁君说：“你们做的很多坏事，林向北都交待了。他把责任都推到你身上，你不说不但保不住党籍，还要受行政处分。你还为他瞒什么？”

转过来又对我说：“廖宁君写了很多检举材料，揭发你在外面伙同那些右派翻案，你还不争取主动，坦白交待，到时候她倒是立了功赎了罪，我看你怎么办！！”

他们忘了一点：不但我和宁君，连我们的父辈也是干“地下党”出身的，各种各样的秘密技巧都已经烂熟于胸，更何况他们的这些招数比起真正的国民党来，简直差得天远地远，哪里是我们的对手。其实我们对于外面的大形势，他们内部的动态，我们互相的“交待”内容和他们“审查”的情况，都已经知道得一清二楚，因为我们有条“地下航线”，“航船”就是我的几个女儿。有时候二女儿林波来送衣服，把字条夹在衣服的袖子里，专案人员要检查，她提起袖子抖了又抖，一看什么又没有，就一挥手让她送进来，结果字条在她手里捏着

呢。有时候大女儿抗美把饭做好，带着三岁的平儿来送饭，平儿一见我高高举起饭盒：“爸爸今天吃干饭！”那字条就在饭里埋着。

直到今天，我还要为此事感谢老石，他把专案人员对我们的态度、打算，都写在纸条上写得明明白白，让我们心中有数，应付自如。

想当年我们打下了天下，满以为从此结束了在白色恐怖下的“地下斗争”，过上了扬眉吐气的日子。没想到建国十几年后，还得让孩子们接着干，真不知道应该对于孩子们的机智而高兴，还是应该为她们而悲哀。

“杨白劳”耍大牌

文革中成立了很多“专案组”，为了收集整人的资料，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外调”，据单位的头头说：来找我写“外调材料”的，比全局加起来还要多，多得那些外调人员只得住在招待所，每天早早的就有十个八个到外调办公室来排班站队。有些态度好点的，说得我高兴，当天就能取货；有些“比着框框”来“卖鸭蛋”的，或者是想搞点“逼供信”的，我就对不起，在办公室里大吵大闹，闹完了让他等上个三天五天也休想得到我一个字，理由很简单：生病了，不能写；要不就是事情隔得太久，要想一想，至于多久才能想起来，不大好说。有的等不及了，就找我单位头头来求情。头头放下架子来找我，说老林你看，我们这个外调办公室都变成了“林办”，专门为你服务，希望抓紧时间写出来，也让我们减轻一点压力。我拿起架子，说你倒是应该告诉那些外调人员，让他们把态度放好点。头头说对对对，我们早给他们打招呼了，说你是服软不服硬，不要硬逼。

有一次，重庆市党校有个女的外调人员，来调查我妹妹林梅侠的情况，看样子想给梅侠找点岔子。我心里老大不高兴，三天后才给她写了材料。她看了我的亲笔材料，说这不行，还得盖手印。我当时火起，“刷刷刷”几下就把写好的材料撕了个粉碎，在桌子上面“啪”地一巴掌：“我又不是杨白劳！”说完后就径直回到“牛棚”。单位头头来说了很多好话，我第二天才又写了一份，让她拿走了，还是没盖手印。

建国后，我经历了大大小小的运动，这类事情见得多了，原先还指望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做人，谁知道还是个“摘帽右派”，和原来没什么区别。我成了“死猪不怕开水烫”，说我态度不好，顶多再多给我一顶小帽子，无所谓。

火炭落到自己的脚背上

文革中曾批判“入党做官论”，就是说想做官，必须入党，入党的动机就是为做官。实际上批判的正是社会上流行的。一些人为了表现自己“立场坚定觉悟高”，一定要对“牛鬼”划清界线，恨得越深、斗得越狠，入党的希望就越大。

我们机关里有个W女士，在斗争我的大会上说：“解放前我父亲受地主的压迫，现在这些‘牛鬼蛇神’又要来压迫我们，我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听着她说的这些话，觉得有些蹊跷，斗争会完了闷着头往前走，路过厕所正想进去小便，却被后面跟着的W女士一把拉住，高声大骂：“你这个右派、流氓，跑到女厕所来干嘛！”说着就围过来一群人，不由分说将我痛打了一顿。

不久就有更想表现积极的人揭发：W女士的父亲之所以“受地主的压迫”，是因为给地主当“狗腿子”，而W女士本人的历史也并不“清白”，最后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多次

“检查”都过不了关。以至于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看见我，都躲躲闪闪，那样子直想挖个地缝钻进去

火炭终于落到了自己的脚背上，不知道那个时候，W女士对于“积极表现”有何想法？

还有一个想入党的“积极分子”，专门看管我们这群“牛鬼蛇神”，一天早晨见我在院内做早操，很不高兴：“你还安逸呢，悠哉游哉的做起早操来了。好！给你一个锻炼身体的好机会：围着院子跑20圈，跑不完不许休息！”

跑一圈大概是200米，我初先满不在乎，不过增加一点运动量，反正成天坐在“牛棚”里闷得慌，借此多活动一下筋骨也好。谁知那时候，营养跟不上，不能再和年轻的时候相比，结果只跑了15圈就晕倒在地。

头头们知道了，急了，指着那“积极分子”的鼻子说：“要是真的出了人命，就不是你入党不入党的问题了，而是你脱不脱得了手的问题！”说着赶紧把我抬到医务室，打了一剂强心针，我睡了两个钟头才渐渐醒过来。从此他们再不敢体罚我了。

所以说，入党的心思不要太迫切，否则你将是祸兮福所伏，适得其反。

“九一三”的巧合

文革中我在牛棚里，唯一的工作就是写材料，写别人的同时也写自己。写着写着，这一辈子悲欢离合，沧桑冷暖，一桩桩一件件都涌上心头，成了写自己的回忆录。我因此多留了个心眼：任何材料都用复写纸一式两份，交一份上去，留下一份悄悄交给孩子们带回去好好保存。

1971年，林彪“九一三”爆炸，实际上宣告了文革的失败。单位上专门为我设立的“林办”也取消了，宣布退回所有关于我的材料，材料包括我自己写的“交待”、检查，外调材料和别人对我的揭发材料，总共居然刚好是913件，和林彪爆炸的日期一模一样。

我找了一辆板车，把这些材料装回家，它们成了我的“宝贵财富”。这些年来，我能写完50万字的回忆录，发表了近20万字30余篇回忆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就靠这“913”份材料的功劳。毛主席说：坏事有时可以变成好事。这次就应验了。

1985年我到北京，见到表叔陈于彤。他告诉我，在“九一三”林彪大爆炸的那天，他同时收到了一份“反对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判决书”。你说说，世界上是不是无奇不有？

我要夸个军代表。

说起文革中的军代表，一般在单位里都是支一派、压一派，对于被支持的任其所为，让他们飞扬跋扈，对于被压制的总是百般刁难，让他们抬不起头，因此受欢迎的还真不多。可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军代表，我对他确有好感。

这位军代表姓高，听说是某军区的副司令员。他到了我们单位之后，同宁君作了一次谈话，然后就把她从“牛棚”里放了出来，理由是家里的五个孩子无人照顾。为什么高副司令对宁君如此“没有原则”？原来，有人向他汇报，说关押我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为《红岩》里的“双枪老太婆”整理了一部回忆录，题目叫做《华蓥风暴》，那是一本大毒草，是违背了中央首长的“三一五指示”，为华蓥山游击队翻案。这位军代表为了弄明真相，就把《华蓥风暴》拿去看，越看越有兴趣，一连看了四个晚上才看完。然后他对宁君说：这本书太动人了！谁说是毒草？这是一本很好的革命教科书嘛！不要怕，我替你做主。这样的革命父亲和母亲，是你的骄傲，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随后他问宁君有什么要求。宁君说现在身体很糟糕，原来体重是 110 斤，现在枯瘦如柴，只有 70 多斤了，想请假同儿子一道去南京治病。高副司令当即一口答应，不但准了假，还同意出外治病费用可以报销。宁君又乘机提出要转组织关系，这样在外面旅行治病都要方便些。这个要求遇到了麻烦：因为宁君当时的党籍还没有被“恢复”。单位头头听了高副司令的指示，跑来对宁君说：只要你承认自己是“替父母翻案”，然后写个检查，就可以给你恢复组织关系，开接转组织关系的介绍信。宁君犟起一股筋，坚决不同意，事情就这样僵持下来，最后还是高副司令下了硬命令，事情才解决。

宁君去南京治病，修养了近一年才回来。

敢把“右派”叫同志的人

我们单位上有个副局长叫李克，是个老革命，政策水平高，文革前，好几次开会时他都拍着身边的座位高声大气招呼说：“请向北同志坐过来！”并对其他同志说，“你们不要瞧不起老林，要不是五七年出了点问题，他今天是不会与我们坐在一起的。”意思是我早已提拔上去了。

文革一开始，李克就为这事挨了不少大字报，说他划不清界限，包庇我这个右派分子。我私下向他表示歉意，他却不当一回事，说老林你放心，这件事情上我没有错，是他们错了，你的问题迟早是会解决的。

还有一次，也是开我的批判会，林大热站起来发言：“向北同志，请你把问题讲清楚，我们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会议主持者马上掉转矛头，把对我的斗争会转变为对他的批判会，说他立场不稳，胆敢把“右派”称同志，会后立马把他关进“牛棚”，于是我们成了知己的“棚友”。

31

废品站里的“内线”

雪中几粒火木炭，胜过千朵锦上花。

文革后期，我们多少有点自由，可以回家了，因为长期被扣发工资，生活上很困难，宁君和几个孩子都生病，真是雪上加霜。

已经是初冬了，女儿们还是穿着单鞋，手上脚上都起了冻疮，溃烂不止。就在这个时候，小董到我家来了，看到孩子们没有鞋穿，很大气地说：“没关系，董叔叔那里有的是，你们来选就是了。”

小董也是地下党，后来也被打成“右派”，与我是难友加战友，无话不谈。此时他在东大街一个废品收购站掌秤，每天收到的旧货用箩筐装，其中就有不少的鞋。我在里面选了两双几成新的高帮皮鞋，花上角把钱买盒鞋油，擦得亮光光的，穿回来得意洋洋。宁君见了，很不以为然：到破烂堆里去拣来穿，羞死你屋先人！可是孩子们却不以为然，第二天都去了废品站。一次小董来说，刚刚从部队回收了一大批战士们换下来的破胶鞋，虽然鞋面都破起了一个个洞，可是鞋底是好的，而且便宜啊，几分钱一双。正在农村插队的抗美和林波立马去选了一大堆，拿回家来洗干净了，用线一针针把破洞织上，带回乡下去，穿了好几年。

可是我们的生活中缺的不仅仅是鞋呀。小董又心生一计，对孩子们如此这般筹划了一番，于是孩子们就趁着天黑去撕街上的大字报，当成废纸拿到废品站去卖。小董假装和孩子们不认识，把那些东西放到磅秤上过秤，要是“上司”在场，他不过“谎报”个五六七八斤，孩子们把废纸扔进废品堆，然后到柜上去支钱。要是他一个人守门市，本来只有二斤重的废纸，

他可以写成 20 斤或 30 斤，这样我们一次就可以多得三两元钱，够好些天的伙食费了。不过废纸的价钱很低，记得只有 8 分钱一斤，而废铜烂铁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废铜，当时的价格好像是五角钱一两，在那个萝卜三分钱一斤、莴笋五分钱一斤的时代，够我们好几天的菜钱了。一次孩子们拣了些铜铁废品去卖，小董又谎报重量，居然多出了五六块钱，孩子们回来乐得直蹦达。

文革后，小董平了反，变成了老董，面貌焕然一新，当上了某杂志的主编，因为长相很像某位国家领导人，还被导演找去试过镜，对于当年他收我们的废品“谎报重量”的事情，老董至今“供认不讳”，还以我家的“恩人”自居，说这就叫特殊时期以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阶级友爱”。

刘孟伉之死

一身正气，刚直不阿的刘孟伉老人，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敌人闻风丧胆，人民肃然起敬，也是我最尊敬的导师和长辈。

文革初期。我和在万县一起做地下工作的老同志赵唯、陈恒之一起去看他，谈到原川东游击队的同志们解放后大都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准备写成材料到北京去告状，却苦于没有钱作路费，难于成行。刘伯父一听，二话没说，转身进寝室拿出他的存折递给赵唯说：“拿去，这是我的全部家当。”我打开存折一看，所谓的全部家当，就是存折上仅有的 65.50 元钱。

直到今天，我想起这件事情，敬佩之情就油然而生：一个参加革命几十年的正厅级干部，一位全国著名的书法家，一位学贯古今的老学者，全部的积蓄，就这个存折上的 65.50 元钱。真可谓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了。

文革初期，像文史馆这样与世无争的地方还是比较清静的。在举国上下都在大造“红海洋”之际，我常常抱了一堆白纸，去请刘伯父写毛主席诗词，他则是有求必应，我因此有幸保留下来几件劫后余生的墨宝，也算是他老人家留给我的最珍贵的纪念了。

随后，打砸抢之风兴起，特别是 1968 年初，江青在那个臭名昭著的“三一五指示”中说了“华蓥山游击队糟得很，叛徒太多了”之后，整个四川参加过地下党的老同志，更是大祸临头。在这之前，刘伯父就被理所当然地打成了封资修的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这时候加上他也是 1927 年的老党员，川东游击队的司令员，又被戴上了叛徒的帽子。

记得是 1968 年冬天的一个上午，我去看刘伯父，他有些紧张地对我说：“现在禁止我外出，还特别打听了你的情况，你要小心。”我当时听了也没在意，这些年我也经历很多了，反正已经成了死老虎，没多大的油水让他们捞。可是就在第二天，全市统一行动，把我们这些“危险人物”统统关了起来，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他老人家。

后来听说，刘伯父也被关进了“牛棚”，专案人员在他家里翻箱倒柜，稍微值钱的东西都被抢走，连他过冬的一件皮衫都没留下。大冷天，他晚上穿着一件薄薄的小棉袄躺在地板上，白天还被押出去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刘伯父总是怒目以待，有时也怒发冲冠骂上几句：“去问你的祖先人，我刘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老子革命时，你还在你地主妈的肚子里没有生出来！”

文史馆那个左派头头，在文史馆是个一般职员，一口的脏话，狗嘴长不出象牙。他心毒手毒，不准家里人见刘伯父，也不准递东西进去。天气很冷，屋内不但不准生火，连老人穿的皮袄也强迫脱掉抢走，晚上裹着一床棉絮，躺在冰冷的地板上过夜。老人病了，不给药吃，还戴着高帽、反绑着双手，拉到一辆敞蓬大卡车上游街示众。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伤、

痛、冻、饿和悲愤气急之下，终于病倒了。医生要求住院治疗，可是单位不开证明，医生凭着良心对老人进行了抢救，脱离了危险之后，才让他回家自行调养。没想到待病情稍有好转，他又被拉去批斗。待到再次送入医院，医生已无回天之力，刘伯父终于在1969年的2月6日去世，终年75岁。

刘伯父花了数十年心血撰写的两部《杜甫研究》书稿，在馆内被窃走，至今下落不明。

1978年初，为了应付门面，有关方面为刘孟伉勉强开了一个很不像样子的追悼会，在悼词里居然把刘伯父的死，说成是“修正主义卫生路线造成的恶果”。后来经过家属据理力争，才很不情愿地承认刘伯父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强加给刘伯父的所有污蔑都被洗清了，为他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名誉，党史部门还为他立了传，对他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价。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学者，北京、成都、万县、云阳等有关部门，对他的诗文、书法、篆刻都作了详尽的介绍；作为一个地区的骄傲，当时的万县地区还为他建立了纪念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作品愈是显得珍贵。不久前，他的书法作品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20世纪中国书法精品展”，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好评。后来，应法国总统希拉克之邀，中国20世纪书法精品展前往巴黎展出，经过再次筛选，刘伯父作为中国百年来最著名的（已故）20位书法家之一，作品参加了这次大展，在巴黎引起轰动。

敬爱的刘伯父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杜桴生之死

杜桴生是岳池人，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虽然早年没有见过廖玉璧和陈联诗，但对他们在华蓥山武装斗争的情况是了解的。1936年车耀先决定诗伯去苏联学习，就曾让她去宜昌去找杜桴生。杜老长期在白区工作，早已上了敌人的“黑名单”，特别是1946年他在《新华日报》成都办事处任经理时，险些被敌人抓捕。

杜老是一根肠子捅到天的耿直人，爽快正直，不管对什么人，有话就要说。建国后，他在川西行署当秘书长，多次顶撞李井泉，致使李井泉对他怀恨在心。杜老是个川剧迷，很受川剧界的人士敬重，为了振兴川剧，他批准重新修建成都川剧的老窝子——锦江川剧院。“三反”一到，就因为此事把他打成贪污分子，他不服，四处告状说：“几十年来，老子提起脑壳干革命，谁稀罕那几个臭钱！”“反右”一来，在“阳谋”的鼓动下，他又提意见，说自己没有贪污，明明是有人故意整他。于是“理所当然”地就成了“右派”。

成了“右派”的杜桴生，被安排在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赋闲，我和李维、王叙五、黄友凡、王朴庵等同志常去看他，这些同志在地下时期都曾同他一起在川北工作过。当了“右派”的他情绪尚好，常拉我们去看川剧，如果他没空，就在一张纸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我们只要拿到锦江剧院售票处，准可得到几张免费的前五排好票——川剧界一直都把他当成恩人。

文革初，这位四川地下党的“大右派”带头起来造反，也不回家了，就住在川大。于是在地下党中许多受迫害的人闻风而起，纷纷奔向川大，在“826”派的支持下，组成了“四川地下党受迫害调查组”，搜集到许多惊人的数字，比如建国前四川有地下党员18000多人，到1968年只剩下几百人了。地下党85%的县团级干部都被打成了“反党右派分子”……这些数字一经公布，不但当时舆论哗然，也为若干年之后的拨乱反正平反昭雪，准备了证据。

自从江青在“三一五”讲话中说“华蓥山游击队叛徒太多”之后，全川地下党员和华蓥山游击队员大都进了“牛棚”。杜老的日子更不好过。他被政协机关的造反派抓去关在黑牢

里，白天拉出来示众，头顶一个沙锅，沙锅上盖上一个五尺长的纸糊黑色高帽，帽子上写有“大右派杜桴生”六个大字，当众坐在一张大桌子前写检讨。一时观者如堵，有人骂他“杜大麻子”，更有小孩扔砖头吐唾沫，拍手大笑。

杜老怎么受得了这般侮辱！一天晚上他从黑牢里打开窗子逃出来，一步一跛地来到我家里。我见他头摔破了，还在流血，一身污泥，一口粗气，不断地骂：“这些王八蛋，我杜桴生作了什么坏事，黑起良心这样整我，我要去北京告状！”

我连忙打了一盆水给他洗脸，准备给他做饭。他一边嚷嚷说：“快给我茶喝，渴死了！”一边又拦着我：“别做饭了，我马上要走，不然他们会来抓我。”我给他找了一根竹棍，准备出门送送他，他说：“不送了，人多影子大，会被发现的。”

我不放心：“现在你准备去哪里？”

他说：“你不管，等我住定了再告诉你。”

就这样，他一瘸一跛地走了，后来才知道，当天晚上他到了白马寺一个老朋友家里，不几天就到北京告状去了。过了不久，又听说把他从北京抓了回来，关在监狱里，到底是什么监狱，家里人也不知道，直到人都快要死了，才通知家里去接人。家人在杜老的一件破棉袄里，发现了他写的申诉书，真是字字血泪，惨不忍闻。

听说他死得很惨，是有人用竹签子戳破喉咙整死的。

谁会想到杜浮生革命一辈子，竟会落到如此下场。

范硕梅之死

范硕梅，垫江人，是个“三八式”的老共产党员。他为人耿直，办事认真，在工厂当厂长时，成就卓然，很讨工人群众的喜欢。可就因为不去吹牛拍马，“反右”时判他“反对领导罪”，再因为不肯“认错”，被认为态度恶劣，定为“极右”。

文革初期，他在“造反有理”口号的鼓动下起来造反，旗帜鲜明地就是要反对“土皇帝”李井泉迫害地下党，要求为地下党和“右派”平反。哪知文革造反是“只准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他知道又上了“阳谋”的当，却不惧怕，还是要反。于是被定为“右派翻天”的典型，在成都市体育场十万人的大会上被批判。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有名气”的女人在大会上控诉他批判他，把他骂得“狗血淋头”——要知道这个女人也曾是地下党员，而且还与他相识。这时，范硕梅认为：有些“披着共产党皮子的人”，与国民党反动派没有什么区别。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领导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国民党还不敢公开抓他，有的人就是被抓去关上几天，也就放了回来。而今天，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度里，同样是为了公理，他却被抓、被斗，还游街示众。他像在国民党统治时被绑赴刑场一样，挨斗的时候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世人见了，都有些莫名其妙。

后来，听说把他弄到南充一个加工猪牛皮的工厂，整天泡在硝水里刮牛皮毛和猪皮毛，不久就全身发肿，死了。

我至今仍不理解，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中华优秀儿女，他们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整死，却无缘无故地死在自家人和“同志”手里。这是为什么，究竟是因为什么啊？

我的子女在文革中

建国后，我有一个短暂时期的平静生活。随后，就被打入了另册。在“敌我矛盾当作内部矛盾处理”的大框架下，20多年来，过着“是人非人，是鬼非鬼”的生活。习惯了，也就无所谓，可是我的孩子们，却承受着政治上、生活上、思想上的巨大压力。

“困难时期”之后，大学扩大招生名额，1965年，大儿子民涛考取了昆明工学院。通知单一到，宁君挥舞着录取通知书在院子高声大叫“毛主席万岁”！随后就泣不成声。是啊，自从我被打成右派后，总感到低人一等，抬不起头，对民涛能否考上大学，总是提心吊胆的。今天意外的惊喜从天而降，喊个“毛主席万岁”就是对狂喜心情的最好表达了。我林家世代终于有了一个大學生，也可告慰亲人的在天之灵了。

可是他的大学刚刚上了一年，文革就来了。

孩子们从小就生活在外婆身边，看到的、听到的和自己所感受到的，一直认为他们的父母和祖父、外公外婆都是响当当的革命者，被人尊敬的英雄人物，怎么可能是牛鬼蛇神呢？他们想不通，于是决定上北京告状。我在老战友江伯言处借了10元，作为他们的“路费”，实际上这点钱在路上吃饭喝水都不够，更不要说买车票了。

两兄妹带着所有的“告状资料”和几件换洗衣服，爬上了北去的火车。因为没有买票，他们先后在马角坝、广元、阳平关、保定等车站被赶下来，晚上就和逃武斗的难民一起，歇在道路旁边、车站里，然后再继续爬车，继续北上。他们爬过煤车，火车一过山洞，煤灰落满全身，出来像个黑鬼。也爬过装着线缆滚子的车，押车的发现了气得大喊：你们这些小鬼不要命了？这些线滚子随时都可能被火车摇下来，压死你们！

到了北京，到处都在查外来人口，居委会常常会在深夜穿堂入室，谁也不敢收留他们，最后民涛才在北京医学院找到他的同学，在人员杂乱的大学生宿舍暂时安下身来。他们每天早出晚归，跑中央文革接待站，跑那些神通广大的群众组织，到处投放告状的材料，甚至直接寄给中南海，可是像往常一样：寄去的所有的材料都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我的五个女儿中，大的三个都下过农村。

最大的抗美，1969年的春天下放在仁寿插队。她吃得苦，别的知青每年都要家里拿钱去补工分，她一到年关，不但要进钱，还要杀猪，鸡蛋花生芝麻黄豆……带回的年货一大堆。她还自学中医，常常给农民看病，扎针、送药、打针都不要钱，是个很受农民欢迎的赤脚医生。可就是因为她的父亲是个“右派”，招工的不敢要，招生的也不敢要，在乡下一耽误就是七八年，一直等到1975年她妈妈去世后，才以“顶替”的名义招回来，在我们系统下属的修制厂当一个车工。这孩子很能写，厂里就把她调到宣传科，可是也得不到“转正”。到1981年，她都有了孩子，又去报考电大。厂里的干部子女都脱产学习，她还是全日工作，只能利用休息时间自学。到毕业的时候，她以超出32个学分的优异成绩毕业，可还是一个工人。好在她在逆境中得到了真实本领，为日后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女林波，在蒲江当知青，由于她表现好，年年都评为先进知青。特别是川西坝子烂泥田，几千年来都没有女子下去过，林波却与男子一道下到烂泥田，在齐腰深的烂泥里干活，被评为县的先进知青代表，却从此落下了病根——到现在还经常脚肿。就是这样，也是最后全靠成都幼师的招生老师冒着风险，才把她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招了回来。

三女儿林鹤，本来死去活来地要去云南支边，却因我是“右派”，她连到千里之外的云南支边都没有资格，最后只好去到我们单位办的知青农场。

最小的两个女儿林芝和林平，因我们被关进“牛棚”后家中无人照顾，派人将其送往岳池一个游击队老交通员那里寄养。这家也是个贫苦农民，当年曾追随廖玉璧和陈联诗打过游

击，他们愿意把帮我们一把，但毕竟生活困难。有一次我同民涛借着调查当年游击队员的情况去看望两个孩子，看见她两姊妹正在山坡上，林芝背着一个比她身体还长的背篋，林平手拿一把猪草，看到这个情景，我心里一酸，不免掉下泪来……

孩子啊，是爸爸害了你们！

1995年，抗美到北京崇文门去找卧病在床的韦君宜，为即将出版的《“双枪老太婆”陈联诗自述》写序，韦君宜拉着她的手说：“你妈妈是个很热情的人。那时候你们家，很穷啊……”

被打成“右派”之后，我被降了五级工资，宁君和几个孩子都生病，一个家真是雪上加霜。

当时我们住在成都东门的三圣街，要到西门的青羊宫省医院，或者是南门上的川医（现在的华西医大）去看病，中间要经过十几个车站，为了省下车钱，经常是大的背上小的，走路去。每次去看病，宁君都清理出一堆存箱底的东西，只要稍微能够值点钱，新旧不论。然后她带着孩子去看病，我就在医院外面的自由市场上摆地摊，卖东西，等宁君看完了病，就来拿钱抓药。有一次，一个买主看上了我身上穿的红毛衣，我当场就把衣服脱下来给了他，伸手接过了钱，交给宁君去买药。

最初几个孩子去照X光，肺上都有阴影，医生诊断是肺病，后来一个主治医生认真检查透视的照片，才断定是肺吸虫病。这个肺吸虫寄生在螃蟹里，几个孩子在河里去抓了螃蟹，没烧熟就吃了，就染上了。肺吸虫在身体里到处爬，三女儿林鹤的虫已经爬到了脸上，鼓起一个包，医生一看说要开刀，否则一旦爬到大脑中，人就无法医治了，说着约好了手术时间。宁君想到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脸上开一刀，心情很不好，从医院出来，碰上一卖膏药的，说是包治百病。宁君买了张膏药给林鹤贴上，几天后去做手术，医生在手术台准备开刀时，却发现虫没了。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再加上肺吸虫病，孩子们都是枯瘦如柴，特别是四女儿林芝，打针都不知道痛了。有一次，宁君把林芝送到二医院去打针，医生连药都不开了，对宁君说：“你不要再费心思浪费钱了，这孩子已经失掉了知觉，没有救了。”宁君带着林芝，坐上三轮车哭着回来，车夫很关切地问她哭什么，宁君说到医生已不医孩子的病了，孩子无救了。车夫停下车来，看看孩子，对宁君说：“不要紧，你用黄鳝骨头熬汤给娃儿喂喂看。我隔壁有个娃儿也是这样虚弱，都以为无法医治了，就是吃黄鳝骨头汤治好的”。

回来后，宁君给我说了车夫的话，我决心死马当作活马医，就立即去到隔壁义学巷卖鳝鱼的地方，从地上拣回一堆划黄鳝扔掉的鱼骨头，拿回来熬汤给林芝喝了。渐渐地，孩子睁开了眼睛，也开始哭了。本来买来鳝鱼连骨头一齐熬汤更好，但没有钱，只好天天去拣没人要的鳝鱼骨头熬汤给林芝喝，结果奇迹出现了：不到一月，她就能站起来走路了。我说林芝真是福大命大，不该死。

宁君把那些药发票都存起来，说是以后留给孩子们，让她们知道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

宁君走得也太快了

最后想谈谈宁君的死。

1968年，江青在“三一五讲话”中，说华蓥山游击队糟得很，叛徒太多。还说四川有个“三老会”反动得很，要镇压。此言一出，整个四川地下党全部落入天罗地网。

我们的日子更难过了。我是个死老虎，没啥搞头，对宁君的批判会却一个接着一个。记得最大的一次，气氛很是紧张：“廖宁君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打倒廖宁君的反动气焰”、

“不准廖宁君翻案”等等大幅标语，扯满会场的四周，还有数十张“廖宁君罪行录”的大字报，贴满了办公室外的墙壁；“打倒宁君”“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等口号，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宁君被押上台，我是当然的陪斗对象。造反派叫她低头，她不低，叫她跪下，她不跪，强行按她的头，把她按倒在地上，她又昂起头站起来，只是昂着头冷笑。会议主持者要她交待翻案的“罪行”，她说：“我父亲是共产党员，是革命的，是被国民党砍头示众的。只有国民党才恨他、骂他、杀他。我母亲也是共产党员，是革命的。她把一生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人民都爱戴她。有我这样的父亲母亲，我很自豪。我要求恢复华蓥山游击队的名誉，我没有错，我没有罪……”

宁君的话还没有讲完，下面的口号声又响起：“不准廖宁君继续放毒！”“打倒廖宁君的反动气焰！”“把她拉到警备司令部去关起！”……

经过这场斗争，宁君就病倒了。诗伯去世后，她因为气恨交加，神经衰弱导致内分泌混乱，得了糖尿病，现在病情加重，转到川医去住院。有些药成都买不到，要外购，我去向单位借钱，总是受到百般刁难，买了药去报销，也是一推再推，借故不报或少报。后来宁君病情有所好转，精神稍好她就唱歌，不停地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宁君在孩子剧团专业学过唱歌，嗓子很好，她怀着复杂的情感唱出的这首歌，哀婉动人，感动了病区内的很多病友。当时曾任地下党川东临委负责人的刘兆丰，与她住在同一个病区，宁君常过去同他摆龙门阵，回忆地下时的故事。

就在我们都高兴地等待着她早日出院的时候，宁君因为感冒导致痰塞，一口痰塞在气管里出不来。她的主治医生亲口去为她吸痰，没有效果，最后只好采取果断措施——切断喉管取痰。宁君的病情越来越重，最后陷入心力衰竭，于1975年5月17日，离开了她不愿离开的女人和这个世界。

宁君只活了短短的50年，就匆匆走了，走得这样急，这样令人心碎。

一时间，呼叫声、哭泣声，响彻整个寂静的病室，久久回旋在病室、医院的上空。

噩耗很快传遍了天涯海角。全国各地发来了八十多封唁电、唁信，在短短两三天时间里，我们就接到了五十多封悼念信和一百五十个花圈。其中有茅盾、艾芜等文艺界的老前辈。有宁君儿时一同战斗的孩子剧团的伙伴，有地下党时的老战友，我们的亲朋好友……家里的灵堂前，一拨又一拨的人前来悼念她，唁电贴满了墙，花圈放满了院子，延伸到了大门外的街道两旁……

（插图：1975年廖宁君病逝后，林向北与子女照了这张合影寄给茅盾先生，以感谢他的关怀。）



几天以后的追悼会上，由地下党老同志李维致悼词，林波代表家属致答词，会场上一片哭声。

宁君啊，你还有多少话来不及向我说，你还有多少事想交付给我完成，你还有多少愿望嘱托要告诉你的儿女，你还有……可是，你一句话都没能留下就走了，走了，永远地走了……

没有结束的结束语

文革中的荒唐怪事，一直想写，不敢动笔，因为这是禁区。同时，回忆起来，又是心酸难受，也不想写。只好就此搁下。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又叫我欲罢不能，决定拿起笔来再写。出于意料之外，写得很顺利，在短短两月多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从建国到文革的10万字的这一段。

特别是文革这一篇，写得特别快。每天以3000字的速度，不到10天，就一气完成30000字。几乎没有什么资料，完全凭脑子的记忆，一幕幕往事像流水一样，哗哗地从脑子里不断倾泻出来。这原因恐怕是这一段经历太叫人难以忘怀，好像昨天发生的事一样。没有思索、没有选择，也没有考虑哪些事该写，哪些事不该写，能记起的，统统写下来。

说老实话，在文革中，我对毛泽东这个神，还是深信不疑的。把我斗得死去活来时，回到“牛棚”，我还蒙着被子痛哭，大声叫喊：“敬爱的毛主席呀，我心中的红太阳，我有多少话儿要对您讲。我有多少歌儿要对您唱！”直到1980年，为我落实政策时，我还在高呼：“毛主席万岁！”

是的，我一直糊涂着，以至在“反右”时上当受骗。文革中又一次上当受骗。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受骗，何时才能清醒呢？

这是个大问题。解决不了，个人永远受骗、人民永远受罪、国家永远遭殃，继续发展下去，真叫国破家亡，那还了得！

这个道理是我离休后才觉悟到，才想通的。基于此，我才如实写下这篇回忆录，让后人知道前人走过的苦难历程，不要再上当受骗。

文革结束了，这场灾难总算有个终结。

我也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党籍和工资级别。而且还当了两年多的工会主席。正在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干劲和速度，企图把过去浪费的时间弥补回来，可是船到码头车到站，我的历史使命完成了，到点了，该退休了。

中共执政几十年，我这个老共产党员前前后后工作不到十年，当年风华正茂的时候，打入了冷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如今想干又不可能了。

这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我们只能在有生之年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以补偿过去的损失。

写点回忆录，让后人继承前人的传统，总结历史的教训，作一个清醒有为的人，不再上当受骗，此愿足矣。

萧瑟秋风今又是 ——中山大学57年鸣放和反右运动杂忆之一

吴兴勇

《向波兰学习》的始末

读了《南方周末》2008年12月4日秦晖教授的文章《从复国到转轨：波兰的坎坷历程》，不禁回想起54年前我写的一篇短文《向波兰学习》，该文的写作经过是这样的：

当时我在广州市中山大学历史系一年级读书，1957年6月1日在中山大学的校园中突然出现了一张题为《向未名湖畔的同学学习》的大字报，署名为“历史系的一群学生”，后来我才知道该大字报是我们这一年级甲班周中坚同学写的。其内容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应向北京大学的同学学习，也要参加鸣放。此大字报一出，校园立即火爆了。按历史系一年级甲班班长何征清同学的诗来说，是“一声春雷击破了康乐园的平静”，康乐园是中山大学校园的代称。鸣放的大字报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贴满了平时贴各种海报的专栏。第二天，学校的党委书记刘望远同志立即表态支持学生大鸣大放，并派校工在校园内另外装设了许多贴大字报的专栏。

学生的大鸣大放从6月1日开始，火爆了一阵，到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开始偃旗息鼓。大字报的内容主要指责前党委书记龙潜在肃反运动中态度粗暴，逼使生物系某女生跳楼自杀。还有历史系党总支书记黄瑜写的一份干部生总结有贬低干部学生的倾向，说干部生出身工农的很少，思想复杂。因此遭到同学们的批评，为此还开了一个会。大约6月4日前后，校园里出现了两张“异端”大字报，一张是《致哥穆尔卡同志的公开信》，由历史系一年级甲班周中坚、熊鄂贻和卢咏尧三位同学署名。一张是《派代表到北京去，要求像波兰一样地转变》，由物理系几位同学署名。两张大字报都认为波兰在克服个人崇拜和斯大林主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是各人民民主国家向良好制度转变的参考系。这两张大字报一出现，就遭到许多大字报的围攻，看来，围攻的大字报是有组织的，代表官方的观点。敢于肯定这两张大字报的招贴极少。有些围攻的大字报公然向周中坚等人挑战，要他们放马过来，就这个问题公开辩论一次，我当时想，名义上是辩论，实质是批判。既然是大鸣大放，就应当让大家充分发表不同的意见。而且，真理也许在少数人这一边。于是，我写了一篇极短的文字《向波兰学习》，以大字报的形式贴出，表示对周中坚等遭到围攻的少数人的支持，我的大字报贴出的时间是6月8日，正好和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同一天。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那篇短文所论述的史实没有超出秦晖教授文章的范围，当时我根本无法掌握秦教授这么多的资料，而且秦教授所论述的许多关键性史实，当时还没有发生（如团结工会组织），有些虽然发生了，但真相没有公诸于世（如卡廷森林惨案，1920年的苏波战争等）。我能看到有关东欧动态的资料极少，但我根据一丝半点的信息，凭直觉猜到，波兰的政治改革克服了重重阻力，还是成功了，不像匈牙利事件那样酿成了流血惨剧。可见波兰的政治精英颇有高明的策略，既能进行改革，又不致于冒犯苏联，使之出兵镇压。这次波兰改革的指挥者哥穆尔卡真不愧为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因此，我在大字报中首先表示向哥穆尔卡同志致敬。

在大字报中，我列举了二战后建立的波兰民主共和国在施政上的失误，从而给人民带来不幸和苦难，如有些人被不公正地判处死刑或长期徒刑，特别是波苏关系不平等，民众心中不平，不平则鸣，社会上要求改革的呼声很大，哥穆尔卡顺应民望，进行改革：平反冤假错案，放慢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发展，注重发展轻工业，给人民提供生活必需品，改革选举法，实行差额选举，又调整波苏关系，不再让一个原苏联军官担任国防部长。

我在大字报中回顾中国1949年政权更迭后的七年来，在施政上也有与二战后波兰类似的失误，政治运动不断，难免会杀错人或整错人，市场上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吃穿住），也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政治生活缺乏民主化，如选举制度等，在对苏关系方面，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有失国格，因此，我认为，今后中国应加强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

周中坚同学写的大字报《致哥穆尔卡同志的公开信》提到“斯大林主义”一词，立刻引起许多大字报的指责，似乎这个名词是对斯大林的大不敬，我特地就“斯大林主义”这个名词作出解释：在东欧，人们普遍用这个名词称呼批判个人崇拜以前存在于苏联东欧的政治体制，对这新名词不值得大惊小怪。

以上是我54年后对这张大字报的大体内容的模糊记忆。不用说，当时使用的表述方式可能更隐晦些，不是明白直书，而是含糊其词。反右运动开始后，我的这张大字报和周中坚写的《致哥穆尔卡同志的公开信》以及物理系同学写的《派代表到北京去，要求像波兰一样地转变》都作为典型的右派言论扼要登上了中山大学的校刊，被称为三张异曲同工的大字报。

我的大字报贴出后，遭到好多大字报的围攻，我知道这是有组织的行动，还有好些衣着端正的人员在抄录我的大字报，我猜测是党委会派来的。看我的大字报的群众也多，难得的是，中文系的某位同学竟贴出一张大字报，说敢于讨论波兰问题体现了青年人的大无畏精神。还有一张小字报，贴在我的大字报的下方，似乎是支持我的，但题目是“学习波兹南工人的英勇精神”，当年的波兰事件中，包括华沙在内的各地仅限于和平示威，唯独波兹南发生了武斗。该小字报突出波兹南的事件，目标所指超出了我的大字报的范围。小字报署名为“地理系一职员”，未署真名，后来查来查去，未找到写大字报的人。

沦为右派后的苦境

我因写了这张大字报，被定为右派，这以后的处境，只能长话短说。我受到开除学籍，劳动教养的处分，在广东三水农场（这是广东的夹边沟），受尽饥饿之苦。当时，我听到送我劳动教养的决定，犹如天雷轰顶一般，感到十分不理解和不适应，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简直无法承受。而劳教处所的环境的恶劣可怕，简直像下到了地狱，我从未在这样的环境生存过，也从未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艰苦劳动了四年后，回到原籍湖南省邵阳市的家中，我家是个大家庭，上有父母，同胞中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我寄住家中，靠哥哥、姐姐们接济生活，而且每天要在街道上干义务劳动。就这样，我由家庭出钱养着，每天给居民会义务服务。我所在的居民会的主任是我父亲手下一位车间主任的妻子，对我还算宽容。有一段时间，居民会还介绍我在某建材厂作工，有一定的收入。

不想文化大革命一来，我这种干义务、由父母供养、吃家里的饭的日子也不能过了。1968年9月，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湖南军区司令杨大易（林彪的下属）在湖南搞了三次“台风行动”，对无辜百姓进行肉体伤害和屠杀，我的无辜的父母亲被当局（革委会）指使电厂工人暴徒杨明浩、刘强夏等打死。父母死后，我失去了庇护，只能单枪匹马地奋斗。不久，我就被勒令下乡，从而失去了城市户口，也失去了容身之地。整整九年，我没有户口，既没有在农村落户，在城市中也没有住房，只靠购买高价粮生活。后来，华国锋上台，搞“双打”运动，我被工商所没收的钱财达到三千余元（相当于当时一个普工的十年工资），还被关押共七、八个月。毛泽东治下我本人还没有被正式关押过（劳动教养场所还可以活动），华国锋治下我却尝受了关押之苦，和许多人被关入斗室，每天吃一点点饭，饿得皮包骨。

当时，我父亲的一个徒弟张泰初先生担任邵阳市教育局局长，他看在当年的关系的份上，介绍我代课。后由邵阳市教育局根据政策安排在邵阳市十二中学教书。大约1978年底，中山大学才派了一个姓林的同志来，为我落实政策。据他说，我的情节最轻，应该予以改正，

当时普遍的改正还没开始，他说我已被确定为第一批改正的对象，当时这种“特别待遇”对我触动不大。二十一年过去了。我对政治已经很淡漠了。只求有个工作就行了。

周济旺同学只在我的大字报上签了个名，就被开除学籍，送往劳动教养。后来他从劳教单位三水农场逃跑（时在 1958 年夏季），被抓捕判刑 12 年。我曾亲眼目睹他被宣判处以十二年徒刑的经过，当时自身难保，对他已没有丝毫同情。周济旺被发往广东清远县劳改场所劳改，他又逃跑，加刑至 20 年，送往青海劳改，后来虽然减了刑，但一直在青海的劳改单位就业，直到右派改正才得以脱离青海，回到中山大学，要求落实政策，由中山大学养着，直到安排工作。

乙班刘法生同学没有在我的大字报上签名，他出身中农，年龄很轻，不知为什么也被打成右派，可能是他和我与周济旺二位右派经常来往吧。他的最严重的右派言论是“西方的文学艺术比较繁荣”。这句话究竟对当局的统治构成多大威胁？以至于将他这个中农出身的学生打成右派，文革时遣送回家，被湖南临湘县白洋田公社书记打死，真是千古奇冤！最近和他同班的江日亨同学（担任过班主席）写诗悼念他：“同学少年刘法生，湖南应届高中生。家乡寄信灾来到，右派加身祸发生。附读随班监改造，历经摘帽未安生。分排工作返原籍，文革遭殃了此生。”此诗对仗工整，平仄合韵，只是没有说出问题的关键：一个劳苦农民的儿子被一群卑鄙的恶棍和寄生虫迫害致死。

我有负李宗武同学

另一个多少受了这张大字报的影响而被打成右派的同学是李宗武，李宗武同学是调干生，喜欢言谈，他在鸣放期间没有写一张大字报，但主持反右的左派分子说他是幕后黑手，到处搜集他的材料。他们从我口中搜集到了一则整他的材料：我的大字报贴出后，李宗武同学看了，对我说，我年纪轻轻，能响应政府号召，参加鸣放，提出向波兰学习问题，是很不错的。以上是他当年谈话的大致内容，因时隔 54 年，详细内容记不清了。

但我不该将李的谈话和我们班上的团支部书记说，此事想起来，至今仍然深感内疚和后悔。我们班上那位团支部书记是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家在广东省中山县，听说她的父亲是香港的政府职员。她相貌端庄而威严，有行政才干，我当时是十八岁，比她要大一岁，但我毫无社会活动能力，处世经验严重不足。我在这位有行政才干的威严的女孩子面前常常显得腼腆，但说话毫无保留，推心置腹。中学时代我和同学交往都是毫无保留的，同学嘛！同窗学友，有什么回避的。

那天，在学校办公楼附近，离图书馆的贴大字报栏不远，那位当团支部书记的女孩子遇见了我，她皱起眉头，表情严肃，问我为什么要写这么一张观点错误的大字报，很不幸，我贴出大字报的那天，正是《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的那一天，反右的信号已经发出，我这张思想越轨的大字报就应该受批判了。因此这位团支部书记和我谈话是带有政治目的的。而我却太迟钝，缺乏政治敏感，却小看了这种谈话的意义。我不是团员，但团支部书记可是政权的代表。

事隔多年，当年我究竟用什么话回答这位团支部书记，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或许我会向她解释我为什么要写这张大字报，尽量为自己辩护。或许我会向她检讨自己在鸣放中的所作所为，由于学习不够，确实发表了一些错误言论。这张向波兰学习的大字报，既然受到围攻式的批判，也是错的了。或许我会表示放弃我的观点。但当时我还是少年，虚心检讨的可能性不大，但为自己辩护的成分很大。

当时这位团支部书记似乎还问了我几个问题，或许她曾问过：有没有人是我的后台，我贴出这张大字报是否有人指使。既然向波兰学习问题是我们这年级甲班的同学首先提出来的，我是否受甲班同学的怂恿，她似乎在示意我将责任推往别人。但因年代久远，她当时是怎么说的，我也记不清了。

我写这张大字报确实没有人指使，写出后也很少人赞扬，因为大字报贴出那天形势陡然变了，由放变成了收（由鼓励向党和政府提意见转入打击迫害提意见、进忠言的人士），因此也无人敢赞扬，唯独李宗武同学对我的大字报作了肯定的评价。

于是，我就将李宗武同学向我说的话向这位团支部书记说了。我确实有给自己开脱的意思，至少下意识地想把罪过推向别人。但这件事一点也不能减少我的责任，因为李宗武同学的话说在我的大字报已经出笼之后，而不是大字报出笼之前。这张大字报是我独立完成的，这已成铁案。而我将李的谈话透露出去，不能减轻自己的一丝半点“罪责”，却对他十分不利。甲班的左派分子正苦于找不到整他的材料，如获至宝，在批判他的会上，一位甲班的同学在会上发言，就他说的这段话进行揭露和批判。从这位批判者的口气来看，他一点也不想给我开脱，却又给李宗武同学增添了一条较重的材料。

我向这位团支部书记讲述李宗武同学的谈话时，绝没有想到这位团支部书记会把李宗武的谈话向外人去说，我把团支部书记当成一位知心朋友，认为谈话是私下交流，双方应对谈话内容保密才对。我真不愿意这段话会成为批判李宗武的材料之一。我再说一遍：我把自己与团支部书记的谈话当成同学间的私自密谈，在下意识中，我可能在努力取得她的好感（男生想取得女生的好感是人之常情），尽量将自己说得不那么离经叛道，思维方向还是正统的，只是受了一些比自己年长的同学的影响，一时思想糊涂而已。

二十多年后，我在北京又遇见了这位女同学，又过了很多年，我在一封书信中向她说起这事，她完全否认有此事，对李宗武同学，她也全没印象了。

当年，李宗武同学好长时间不理睬我，但最后他仍原谅了我。据他说，他原谅我的理由是我年轻缺乏经验。后来我和他还有极短暂时期的交往。为什么说是短暂呢？因为当时离处理右派只几个月左右的时间。最后我和李宗武都获得最重的处分：开除学籍，送往劳动教养。

李宗武的赤子之心

李宗武同学性格平易近人，善言谈，乐观开朗，但他太单纯直爽了，不善于保护自己。遇上专制的制度，他很容易受到打击，因为他是个爱好自由、无所顾虑的赤子。他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愿意为自己的理想献身。他比我年长许多，是调干生，即原来是国家干部，享受干部生的待遇，有较多的助学金。但他的生活十分俭朴，衣着很朴素，把多余的钱送给生活困难的同学周中坚等买书。

他招致最严厉的处分是因为他在一次批判会上的表现。我对这次批判会记忆犹新，开会的地点是中山大学的有小钟楼的礼堂。这本是岭南大学留下的一座美丽的西式建筑。此时此刻人们却在里面组织举行一次东方式的黑会——由全校的所有左派分子斗争全校的所有右派，狂风暴雨，杀气腾腾，其气氛可想而知。这是党委书记刘望远（听说此人后来没有好结果）精心构想出来的一个新鲜花样，也是临近右派处理前的一次左派分子示威和对右派的重大的侮辱。

这次斗争会究竟有多少可怖的项目，今天我已记忆不清，留在我头脑里的只是那些左派分子们的穷凶恶极的嘴脸、张牙舞爪的表态、厉声的呵斥和恐吓的言辞。当然嘛！右派受到的打击越严酷，左派分子的前途就越红火，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而且后来为事实所证实的。

在那次批斗会上，挨斗的近两百个右派有各不相同的表现。多数挨斗的右派都只能低头认罪，将莫须有的罪名揽到自己头上——我自己就是这样应付批斗的。甲班（属我们这年级，下同）的右派蔡某，积极揭发，将同一个寝室的同学说成是一个右派集团，名叫 309 集团（因宿舍的编号为 309 号），从而给左派分子们提供了十分有用的材料，试图立功，争取从轻处理。甲班另一右派汪某承认自己是 309 集团的头目（还在全校的广播站上作长篇检讨），将 309 集团说得仿佛真有其事一般。二年级的哲生同学则将自己的大字报内容说成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声嘶力竭地和有组织有领导的批斗者们争论，以卫护自己。甲班周中坚同学尽量和左派分子和解，不加重与他们的矛盾，能解释的就解释，能认错的就认错，甘愿接受批斗和处分，结果，他虽然是全校第一张学生大字报的写作者，却获得相当轻微的处分。

李宗武同学本隐身于人群深处，不愿被人察觉，但不幸的是，批斗临近结束时，一个主持会议的干部发现了他，见他面呈讥笑，便将他拉到前台，接受所有左派分子的批斗。过去，同学们给李宗武同学起了个绰号：老武爷。左派分子们说老武爷是个潜藏很深的幕后人物，可这下子他被迫走上了前台。他面临成百个左派分子的丧心病狂的嚎叫，他应该怎样应付呢？

李宗武同学在这次批斗会上说了些什么，我已记忆不全，但我还记得他当时说话的神情和身体姿势，他的神情和姿势没有露出丝毫屈辱和胆怯的征象，他保持了一个人应有的尊严。他谈了自己的观点，他没有迎合潮流，不编造假话，只谈自己内心真实的感触，言辞即使有点激愤，但没有攻击和辱骂的话，他不像那些左派分子，整个晚上指着右派的鼻子放肆谩骂。他是在和这些左派分子讲道理，他说的是充满人性的语言。他绝不会讨好左派分子，更不会向他们乞怜或投降，只谈论他自己对目前这种荒唐局面的真实看法。

左派分子们不让他把话说完，他们声嘶力竭地阻止他说下去，并且接二连三地质问他。对左派分子的质问，李宗武同学一一耐心作答。

当时左派分子们问了李宗武同学什么问题，时隔 50 多年，我已记不清了。但这是一场激烈的唇枪舌战，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两种思想、两种立场的激烈交锋。在今天这个最后摊牌的会议上，李宗武同学亮出他的全部真实的思想，绝不隐瞒，绝不假装，也绝不低头，他一人和十多张嘴争辩，保持了自己的立场和尊严。今天我只能凭模糊的印象转述他们对答的要点（不是原话）：

左派们质问道：

“你这个右派分子，不低头认罪，继续散布右派言论，为什么？”

李宗武同学回答。“我没有罪。我讲的是实话，不是右派言论。”

左派分子们质问道：“你不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罪行吗？”

“所谓左、右派，那是政治家们的事。我只是个普通的大学生，不是右派，我觉得这事很荒唐。”

左派分子们质问道：“你要坚持你的立场到底吗？”

“是的。”李宗武同学的斩钉截铁的回答，具有雷霆万钧之力。他确实说了这两个字：

“是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是毫不含糊地说出这两个字的。在场者都听见了。我今天仍记得一清二楚。这两个字在大厅里回响了很久很久，使得所有的左派分子们一时都瞠目结舌，不知该说什么好。大会的组织者也慌了，不知如何是好。李宗武同学的勇敢行动粉碎

了会议组织者要对所有右派师生加以人格侮辱的计划，结果，战败者是左派分子们自己。他们一个个都垂下头来，像斗败的公鸡，败下阵来。大会的组织者匆匆宣布散会，免得这种左派败、右派胜的局面持续下去。

右派同学的凄惨命运

那次大会的第二天，学校当局动用其杀手锏，将李宗武同学开除送往劳教，这是当局的报复手段，其严酷性令所有的右派同学都感到震惊，人人自危。

几天后，蔡全照同学在吃早餐时对我说，他昨夜做了一个梦，梦见左派分子们将老武爷（李宗武）杀了，将他的肉挂在市场上卖。这说明当时的白色恐怖所造成的可怕的心理效应。

过不多久，我也被开除送往劳动教养，因而在广州劳教所和广东三水农场见过李宗武。在那种场合，我们实在无话可说。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再也见不到李宗武同学的踪影，我和也在该农场劳动的汪剑鸣同学估计，李宗武恐怕是被送到青海去了。

我们的估计是对的，大约在 1958-1959 年之交，因金门之战，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关系紧张，三水农场中的政治犯都被送往青海，我和汪剑鸣也是政治犯，可能管事者见我们还有一定的劳动力，就不列入遣送的名单之内，留在水三农场，李宗武同学是个理想主义者，缺乏务实的应变能力，躲不过被遣送青海的命运。

青海地区海拔很高，他们被送到青海的气候最恶劣的地区，大部分因不适应当地的气候和缺氧环境而死去，活着回来的很少。李宗武同学大概就因此罹难了。1978 年右派摘帽改正后，我再也打听不到李宗武同学的信息。他永远消失在西北的劳教场所。一个有理想的青年在那样的年代无法活下去。

44

另外的几位右派同学的情况是这样的：

汪剑鸣同学和我一样，在水三农场劳教三年后，回到湖南故乡，他回湘潭老家后，在一家建材厂干重体力劳动活，文革初，“革命群众”要他挂牌子，他坚决抵制，与其发生肢体冲突，被判刑 8 年，后平反出狱，他遇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劳改场所比劳教更可怕，可见他对这段经历心有余悸。他这个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朝鲜战争的功臣，到平反改正后近五十岁才结婚，未生下一男半女。

甲班的右派同学蔡全照可能因反右时揭发有功，受到较轻的处理，劳动几年后又回校读书，但在重提阶级斗争时可能又被开除，他也许没有活到平反，即使活到平反那年，也很快凋谢，以后我参加同学聚会时，听说他已亡故。

甲班的班长何征清，被划为右派后，劳动几年后又回校读书，也在重提阶级斗争时又被开除，不幸的是，他回到家乡湖南道县后，在文革中遭遇道县杀害“黑五类”的惨祸，他也被杀害。

在周中坚同学的大字报《致哥穆尔卡同志的公开信》上签名的有两个同学：熊锷贻和卢永尧，两人的命运形成反差，熊锷贻本是湖南人，干部生，但父母在香港，五七年暑假，他见形势不对，就匆匆去了香港，逃脱了整治，若干年后，他以加拿大华裔实业家的身份回家乡湖南长沙望城区投资，受到热烈接待。

卢永尧的父亲本是香港老板，他本来很可能成为实业家，但不听父母劝告，坚持回广州读书，结果因右派问题滞留内地改造 21 年，从此心灰意冷，不愿干任何工作，终身未婚。

另一位替周抄写这张大字报但未签名的姚展雄同学被定为中右，毕业后一直教中学。改革开放后才调回广州市广东地方志办工作。

《向未名湖畔的同学学习》、《致哥穆尔卡同志的公开信》等两张重要大字报的撰写人周中坚同学因善于应付，小心谨慎，虽被划为右派，可劳动几年后又回校读书，后又顺利毕业，他还想读研究生，未获准，被分配在河南工作，改革开放后考入广西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

“萧瑟秋风今又是”……今天看到秦晖教授在《南方周末》上的文章《从复国到转轨：波兰的坎坷历程》，不禁引起我的联想。当年我们几个学生在大字报中偶尔涉及此敏感问题，就遭到如此打击，今天秦晖教授如此大谈特谈，却安然无恙，真令人感叹不已。我们生活的这个“人间”真是变了啊！

教育家马客谈与一本《校友录》

何蜀

在母亲的遗物中有一本她珍藏半个多世纪的校友录：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三月编印的《国立重庆师范学校校友录》。

这本校友录纸张发黄，开本不大，封面简陋，比现在那些豪华装帧的校友录显然差了许多，但内容却自有其特色：它既不按校友的名气、地位来特别突出某些“知名校友”，也不忽略那些已经辞职离校的教职工或未在校读毕业的学生（我母亲就只读了两个学期，未毕业，仍然列名其中），总之，所有与学校有过教学关系的师生全都一视同仁地“榜上有名”。

45

抗战时期的国立重庆师范学校，坐落在重庆北碚嘉陵江边。校长马客谈（1894—1969），江苏六合人，是民国史上值得记载的杰出教育家，抗战爆发后，在首都南京及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战区的中、小学校因遭敌机轰炸而被迫停课，1937年12月中，马客谈与另一教育家李清悚建议教育部，“在后方设立国立临时中学，俾续弦诵。”随后，马客谈与李清悚、薛钟泰、刘奇、王万钟等教育家，率领在汉口登记并编组为三个大队的京（首都南京）、苏、浙、皖等地学生1037名（以后在宜昌又陆续登记编组了第四大队），在川江水枯船少更加上敌机轰炸的恶劣条件下，分批乘船经宜昌、万县辗转撤入四川，至1938年3月13日，各批学生全部到达重庆（这一悲壮的战区中学师生撤退经历尚未见到详细的记载）。

1938年9月，马客谈受聘主持了这所各科齐全的师范学校（先名国立第二中学师范分校，1940年3月由教育部令独立设置，定名为国立重庆师范学校）。学校设有普通师范科、幼儿师范科和音、美、体师范科，加上保育训练班和短期培养师资训练班，还有在镇外山村开辟的家庭教育实验区，成为培养各种师资人才的摇篮。

马客谈给学校定下的校训是：“良师兴国”。他认为“有了优良的教师，才有优良的民族”，良师可以培养教育出众多优秀的学生并影响整个社会，从而使贫弱的中国振兴起来。因此，他把教师称作“民族的乳娘”。马客谈亲自为国立重庆师范学校写了校歌歌词（这歌词连同歌谱是母亲他们的一些老校友在晚年回忆写出来的），这首激昂奋发的歌曾激励着师生们度过艰苦的抗战岁月：

我们追随着抗战建国的中央，
弦诵在天府之邦。
耳听到嘉陵江流怒吼声的激昂，

沸腾爱国的热血满腔。

认清清时代正紧张，

一心要学做民族的乳娘。

端品行，勤学问，保健康，

终生从事于教育，不断的本位向上……

1946年暑期，学校复原迁回南京（迁南京后更名江苏省立江宁师范学校）。离开重庆前，学校编印了这个校友录。马客谈为校友录写了一小序，全文如下：

本校成立于抗战初期，顽寇侵逼，民族西移，初意在适应国难，暂谋战区师生不绝弦诵而已。然政府长期抗战之国策既定，则教育事业亦当作百年远大之图。于是本校同人，共本良师兴国之旨，虽居艰难困乏中，努力教育，未尝稍懈。即学校一切设施，亦不敢藉口战时而少事苟简。八载以来，幸能以一战时救济性之教育机关，勉力形成一平时实验性之师范学校，此同人可告无罪于学校者也。

本校学生最初来自战区，身历万难，殊知自奋，即今服务社会或更求深造，以学术事业表现于世者，颇不乏人。及后方青年闻风来学者日众，吾人每于招生之际，严于录取，又辄为文昭示诸生，使知师范学生生活清苦，而国民师资责任重大，必须多方考虑，慎自抉择。于是凡经录取者，率多有志师范之士，入校之后，又无时不浸润于良师兴国之教育空气中，三年教训，出而服务，亦多为社会人士所称道，于今近千人矣，此则学生亦无愧于学校，尤为同人引为欣慰者也。

迨者抗战以胜利结束，本校亦将有所更张，惟过去师生一番努力，将成为不可磨灭之事实，为求他日情愫互通，精诚团结，用刊此册，以资纪念。希我校友对于本校之精神与历史，永矢发扬维护之忱，并因之而爱及此册也。

没有官话套话，字行间充满了对自己所献身的教育事业的热爱。

小序之后是马客谈的题词：十首七言绝句，每首诗下面都有简释。选数首如下：

巍峨黉舍仰东山，作育良师济国艰。

植幼正蒙研教术，广储化雨布人间。

校本部踞东山之颠，普师幼师两科弦诵其间，毕业人数最多。

层楼雅洁馆先生，举世滔滔独葆贞。

不倦教人不厌学，小窗深夜暗灯明。

教员住室在乐观院前有楼三级，轩敞幽静，本校多数同人研憩于此。

析薪数米扰昏朝，共体时艰志不挠，

咬得菜根成百事，宁捐温饱乐箪瓢。

餐厅为校长及训导人员与学生会食之所，战时物价高昂，时虞不给，然茹蔬食粝，犹共甘之。

十亩方场晓气凌，健儿队队逐云腾。

一鸣画角千人肃，青白红旗映日升。

运动场即北碚公共体育场，每晨升旗早操，镇上各校学生与受训壮丁咸集于此。

数仞西冈一径斜，半村半郭有人家。

好将梁孟欧曾教，播向山颠与水涯。

家庭教育实验区，为本校推广处所主办，择地镇外西山路，人家相望，施教称便。

在题词之后是一篇简明扼要的《校史》（不足 3000 字），从抗战初期战区学生如何撤入四川（前述迁川经历即出自该《校史》），在重庆选址北碚建校，说到学校的一步步发展，摘录若干内容如下：

二十九年四月租用兼善会堂为本校大礼堂，五月敌机炸北碚，体师科教室及宿舍全被毁，校具损失颇多，唯幸未伤人。六月购置女生宿舍，校舍遂渐加扩充。九月即增设体育音乐师范科美术劳作师范科及普通师范科各一级，连前计共九级，于是行政组织亦按法令规定分设教务训育体育事务推广五处，规模更日益完备。

三十年一月在北碚新村中购宫殿式楼房一座，命名乐观院，作为音师美师教室之用，七月代教育部举办迁建区小学教师训练班，八月设置迁建区北碚小学为第二附属小学，九月添设幼稚师范科，音乐师范科，美术师范科各一级，连原有之普通师范科，体育师范科五科之基础具备。十月教育部委办第二家庭教育实验区，本校之事业，更日益推广。

三十一年三月举办四川省在职小学体育教师训练班，四月响应师范教育运动举行师生宣誓，教育演讲，教育座谈，并举行成绩展览，教学演示，话剧表演，平剧表演，昆曲表演，音乐会及运动会，五月购置萧氏教育藏书一千种，图书设备大加充实。

三十一年六月购置新村教职员宿舍并增设防空洞，九月又添设幼师科音师科美师科各一级，并呈准将幼稚师范科改为三年制。

三十二年二月开办第二届体育教师训练班。三月在合川及北碚刊印地方教育辅导旬刊及周刊。八月更添设幼稚师范科，音乐师范科，美术师范科各一级，遂完成五科十五级之编制。

是时，一般物价日益高涨，校中教职员生活，因之日益艰窘，为安定教职员生活计，故对于教师福利事业之增进，尤不遗余力，八月，在校本部后侧租教职员住宅一座，十月，复添租一座，其后又增建平屋八间，计能容纳眷属二十余家，又复成立消费合作社，公共食堂，使教职员之生活方面，得减少若干苦痛。

.....

透过这些言简意赅的记载，可以看到那一代教育家们是如何在艰苦的战时条件下努力发展着教育事业的。从他们的实践中，也可以看到蒋介石提出的“战时教育要作平时看”的长远考虑确实得到了响应和落实。

这篇《校史》最后作了一个总结：“本校历届毕业学生计至三十五年七月止，有普通师范科九届，体育师范科五届，音乐师范科美术师范科各四届，幼稚师范科三届，体育教师训练班两班，保育师资训练班两班，小学教师训练班一班，合计共毕业校友七百九十人，现皆分在全国各地，其服务之能力与精神，尚能为社会所称道。”

这本《校友录》的主要内容是师生名录，分为：

教职员名录——

（一）现任教职员，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在本校现任职务、到校年月、永久通讯处。

（二）历任教职员（以退職先后为序），包括姓名、在校任职、在校年月、备注（已故者注明“死亡”）、永久通讯处。

学生名录——

（一）毕业学生（按各科各届分别列出），包括姓名、别号、性别、年龄、籍贯、升学状况、最近服务地点、永久通讯处。

（二）从军学生，包括姓名、别号、性别、年龄、籍贯、升学状况、最近服务地点、永久通讯处。（大多是在抗战后期响应政府号召到的青年军）。

（三）本年度应毕业学生，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永久通讯处。

在教职员名录中列出的教员任职，除去通常所知的国文、历史、数理化、音体美等教职外，还有些今天看到会感到新鲜（而在当年可能很平常）的教职，如地方自治教员、博物教员、家事教员、农事教员、卫生教员、昆曲教员、平剧教员、话剧教员、戏剧史研究教员等。美术教员中还专门有国画教员、西洋美术史教员，音乐教员中还专门有国乐教员、提琴教员，体育教员中还专门有国术教员。从这样细致的分工安排中可以看出该校的教学规模与主持者高瞻远瞩的教育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从名录中可知，该校“现任教职员”中的昆曲教员，是著名的“民国才女”张充和，记载的内容是：张充和，性别：女，年龄：三十一，籍贯：安徽合肥，到校年月：三十一年（即1942年），永久通讯处：上海南海路懿园三十五号。在目前看到的一些有关张充和的生平介绍中还未见到对她这段教学经历的记载。在《校史》中所提到的昆曲表演，想来应该是由她所主持的吧？

关于“老三段”

陶渭熊

“老三段”是文化革命中经常背诵的大救星的三段语录。这个词语产生于什么时候我已经记不清了。文化大革命中，不管开什么会，不管是大会还是小会，或者几个人的碰头会，在开始之前都要背诵大救星的语录。根据会议的内容，所背诵的语录有长有短有多有少，但有那么二三段语录几乎没有例外地出现在任何一次背诵活动之中，成了“老生常背”，所以后来大家就给这三段语录取了名字，叫做“老三段”。就是这个名称的由来。再后来，就把老三段引入早请示、晚汇报、饭前仪式等等活动之中，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只要仪式主持人说“背诵老三段”，大家就一流二水地将这三段语录一口气背完。

那么“老三段”是指哪三段语录呢？在我的记忆之中是这样的：

第一段：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二段：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看历史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就是历史唯心主义。

第三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我在拙作《“三忠于四无限”运动忆趣》（《巴山夜雨》11期）中本来是引用的这三段语录。后来在发刊的时候，编辑先生给改了，改成这样：

第一段相同。

第二段：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第三段：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我得说明，我对于编辑先生的修改没有任何意见，因为这实在不是什么要紧事。但是我想在此讨论一个问题，最能代表大救星思想的，是前面那个“老三段”呢，还是后面的“老三段”？

先看前面那个老三段。第一段说明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和指导思想（马列主义）。第二段说的是认识事物的基本观点，即阶级斗争观点。第三段说的是行动准则——暴力革命。我认为这三段语录是大救星思想的精髓，是大救星思想最精辟最准确的表达与概括，最有资格荣膺“老三段”这个称谓。

那么什么是大救星思想？尽管阐述大救星思想的著述汗牛充栋，但在下认为，其实就是一句话：大救星思想就是关于暴力夺权和暴力掌权的思想。暴力夺权，正如大救星自己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倒国民党坐江山，就是靠的这个；暴力掌权，就是用不断的政治运动，不断的整人來维持统治。试回忆一下大救星在位时发动的每一场运动，如清匪、反霸、土改、镇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革等一系列解决敌我矛盾的政治运动，哪一个不是大救星代表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用阶级斗争观点指挥的急风暴雨式暴力革命？对待地富反坏右和一切反动分子，当然不会“请客吃饭”；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大救星何时又“温良恭俭让”？渭予不信，请回忆一下：统购统销的时候，哪一个翻身农民敢不提高觉悟吃糠咽菜，把“余粮”低价买给政府？农业合作化，虽说大救星有言在先“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但是哪个农民敢不“自愿”，哪个敢“自由”？哪个敢不“自觉自愿”把耕牛农具交给集体？人民公社化，哪个敢不“一大二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公共食堂化，哪个敢不“自愿”砸烂自家锅灶，端着破碗去公共食堂享受每天3两（16进位制）高粱米的“幸福生活”？……这些丰富多彩的内容，都统统包含在“老三段”所表达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之中。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老三段”更像一块植入脑髓的芯片，控制着每个人的思想言行。

后面一个“老三段”当然也讲了领导力量、指导思想，工作方法——相信（依靠）群众相信（依靠）党，工作作风——注意政策和策略。这可以说是大救星的英明之所在，也可以说是他的权谋之所在。相信群众的目的是什么？注意政策和策略的目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进行阶级斗争，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从大救星的一生所发动的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每次运动都有一批整人者和被整者，下一次运动，整人者往往成为被整者，被整者在一定条件下也可成为整人者，整来整去，每次整百分之五（有些运动还远远超过百分之五），若干个百分之五加起来，除了大救星自己，几乎找不出没有挨过整的人。大救星就是这样“相信群众”！就是这样注意“政策和策略”！全国十亿人民，就这样被大救星玩弄于股掌之间。所以说后面那个“老三段”不是大救星思想的实质，仅仅是一种表象而已；和前面那个“老三段”比较起来，不过是前者的从属和演绎而已，不是文化大革命中风靡一时的“老三段”。

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语录

●凡是对真理没有虔诚的热烈的敬意的人，绝对谈不到良心，谈不到崇高的生命，谈不到高尚。

●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

●世界上还有些比国家更重要的，那便是人类的良心。

●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之。人皆知自由好，罪恶虽假自由之名而行，人不会将罪恶归之于自由。

●扼杀思想的人，是最大的谋杀犯。

●我们来到这世上，为的是发出光辉，要有光，太阳的光是不够的，必须有心中的光。

50

●一个人要帮助弱者，应当自己成为强者，而不是和他们一样变成弱者。

●有了朋友，生命才显出它全部的价值。

●只要你抱着希望，死去的意志就会在你内心复活。

●先相信自己，然后别人才会相信你。

●一种理想，就是一种力！

●世上惟有一个真理：便是忠实于人生，并且热爱人生。